DOI: 10.6503/THJCS.202209_52(3).0002

隆慶至萬曆初期 (1567-1583) 的京邊軍事革新*

李華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摘　　要

隆慶至萬曆初期 (1567-1583)，明朝在北京近郊薊州、昌平一帶實行大規模軍事革新計畫，由薊遼總督譚綸 (1520-1577)、名將戚繼光 (1528-1587) 主持改革，以戚氏訓練有成、抗倭功高的浙兵作教練，整頓、訓練薊昌軍隊，全面修城造臺，使嘉靖庚戌之變 (1550) 後衰弱的明朝北邊國防實力大為振興。與此同步發展的「隆慶和議」——明朝與蒙古西部強酋俺答 (1507-1582) 議和，准其貢市請求，益增「京邊軍事革新計畫」之成效，是十六世紀後半長城東、西兩邊明蒙關係從戰爭走向和平的兩件大事。此計畫也使東部察哈爾高原的蒙古大汗收斂，足見其重要性，唯其形成及施行步驟、明廷之支持，還有最終的新定制，鮮見研究者論及，因此，本文將以這些問題為主，梳理史實並檢視其間的明蒙關係變化。

關鍵詞：薊州，軍事改革，戚繼光，明蒙關係，明代軍事史

---

* 本文係國科會專題計畫「十六、十七世紀長城地帶的漢蒙滿（明蒙清）部族關係與地域發展」(MOST 109-2410-H-366-003-MY2) 研究成果之一。寫作拙稿過程中，眾師友與評審們在不同場合中給予指教，在此一併申謝。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專案助理教授，電子郵件信箱：huayen@cc.ncue.edu.tw

一、前言

明朝建立時，北邊便與蒙古對峙，仁宣之後，明軍主要據長城而守，蒙古則多沿邊搶掠。世宗 (r. 1522-1566) 長年嚴拒蒙古俺答 (1507-1582) 等部的貢市請求，游牧為生的蒙部因日用匱乏，復遭天災而度日艱難，卻得不到漢地物資，終於嘉靖二十九年 (1550) 七月，糾眾十餘萬大寇北京，要求貿易，此即「庚戌之變」。[1] 變後，明廷始設薊遼總督一職，連年以京邊昌平、薊州兩鎮為主增兵增餉，並延及鄰近的真保、遼東兩鎮，北邊的軍事革新蓄勢待發。[2]

然而，即使明廷增調他鎮之卒協防薊州鎮，強化北京防衛，但邊軍虛弱依舊，民窮財困，[3] 世宗仍拒開邊市，長城防線依舊警報頻仍。海防上，世宗也厲行朝貢體制的外交、外貿形式，嘉靖初罷市舶司，停止海洋外貿，遂引發倭寇橫行東南海上，導致「南倭北虜」同時並起，明廷因此無暇徹底解決邊防問題。自嘉靖二十六年海寇犯寧波、台州起，張經、胡宗憲、俞大猷、戚繼光等文武戮力作戰二十年，迄三十九年復設寧波、泉州、廣州三市舶司，最終於萬曆中期全面穩定復設該三

---

1 胡凡，〈論明世宗對蒙“絕貢”政策與嘉靖年間的農牧文化衝突〉，《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5.4（北京：2005），頁 43-55；張雪瑞，〈淺論明世宗時期明蒙關係〉，《北方文學》，3（哈爾濱：2016），頁 160-161；孟修，《土木之變與庚戌之變比較研究——朝貢體制框架下的明蒙關係新探》（哈爾濱：黑龍江大學碩士論文，2010），頁 26-29；黃彰健等校刊，《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以下各《明實錄》均同此版），卷 363，「嘉靖二十九年七月戊申」，頁 4b-5a；卷 364，「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壬午」，頁 9b-10a；Carney T. Fisher, “Smallpox, Salesmen, and Sectarians: Ming-Mongol Relations in the Jiajing Reign (1522-67),” *Ming Studies*, 1 (1988), pp. 1-23.
明世宗峻拒蒙古求貢，實錄編者證言：「按虜自壬寅以來，無歲不求貢市，其欲罷兵息民，意頗誠懇，當時邊臣通古今、知大計如總督翁萬達輩，亦計以為宜，因其款順而納之，以為制禦之策。乃廟堂不為之主議，既大言閉關以絕其意，又不修明戰守之寔而為之備，反戮其使以挑之，至於戎馬飲于郊圻、腥羶聞於城闕，乃詔廷臣議其許否，……自此之後，議募兵、議增餉，輶軒使者旁午於道，又調各鎮之卒以戍薊鎮，而兵愈弱，……猶賴主上威明，總攬乾綱，未至失墜。……語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非虛言也。」黃彰健等校刊，《明世宗實錄》，卷 364，「嘉靖二十九年八月甲申」，頁 12b-13a。

2 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10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明萬曆四年 (1576) 刻本），凡例，頁 11；卷 2，頁 71；卷 3，頁 98；卷 8，頁 444。

3 「〔庚戌之後〕議募兵、議增餉，輶軒使者旁午於道，又調各鎮之卒以戍薊鎮，而兵愈弱，為一切苟且之政，以斂財供費，而民愈困。」黃彰健等校刊，《明世宗實錄》，卷 364，「嘉靖二十九年八月甲申」，頁 13a。「該大學士嚴嵩等題稱，薊州一鎮密邇京師，關係尤重，但兵馬單弱」。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7，〈勑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檜〉，頁 227。

司，才使倭寇禍亂平息。[4]

隆慶初，海疆趨靖，陸疆則因中央的積極作為而出現轉機。大學士張居正 (1525-1582) 等任命王崇古、方逢時、譚綸、戚繼光等知兵文武，出守宣府、大同、山西、薊昌、遼東等重鎮，鞏固兵備，並善用時機，促成四年 (1570) 十月與俺答締造的「隆慶和議」，後續河套互市、三鎮貢市等發展，更為薊昌進行中的「京邊軍事革新」贏得更長久的和平環境，終至成功。[5] 明廷為強化北部邊防，同時展開「隆慶和議」與「京邊軍事革新」兩件大事，前者因俺答之孫把漢那吉事件而意外地順利完成，後者則循序漸進，於隆慶末亦大具規模，先後起到強化東、西邊防的作用。

「京邊軍事革新」計畫作為一國大政，《明史．本紀》未見，[6] 明代軍事史研究中也鮮少單獨出現，反因隱身於名將戚繼光 (1528-1587) 生平事功而為人所知。[7] 戚繼光獲選為此計畫的前線執行者，曾親歷庚戌之變北虜威勢，又有十多年與多任文官合作對戰南倭的輝煌戰績，在戰略、城防、練兵、行政資歷上都是大將首選，而他確實竭盡心力達成計畫，再現邊防安靖，保衛明蒙間的長期和平。[8] 此計畫從擬訂、修改、成型、執行、再修改、終成定制，一路飽受質疑，但明廷也罕見地一路支持，許多研究均提及大學士張居正等人脈關係的助力，[9] 但多未觸及具

---

4 張廷玉等修，《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81，〈食貨志五．市舶〉，頁 1981；卷 18，〈世宗本紀二〉，頁 238-251。

5 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頁 672-679；唐玉萍，〈張居正、高拱在“隆慶和議”中的作用對比〉，《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31.5（赤峰：2010），頁 17-22；趙毅、于寶航，〈張居正與戚繼光關係論略〉，《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6.5（大連：2013），頁 747-753；張廷玉等修，《明史》，卷 19，〈穆宗本紀〉，頁 257-258。

6 張廷玉等修，《明史》，卷 19，〈穆宗本紀〉，頁 253-258；卷 20，〈神宗本紀一〉，頁 261-278；卷 21，〈神宗本紀二〉，頁 279-293。

7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臺北：食貨出版社，1995），頁 205-247；范中義，《戚繼光傳》（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212-340；〈戚繼光在薊鎮〉，收入中國明史學會編，《明代薊鎮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唐山：中國明史學會，2010），頁 9-47；童來喜，《戚繼光》（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紫西，〈戚繼光與薊鎮長城防務〉，《文物春秋》，2（石家莊：1998），頁 65-67。

8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55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清道光二十七年 (1847) 仙遊崇勳祠刻本），卷 1，頁 97-114；黃彰健等校刊，《明世宗實錄》，卷 424，「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丙辰」，頁 5b；卷 501，「嘉靖四十年九月甲辰」，頁 7a-7b。

9 趙毅、于寶航，〈張居正與戚繼光關係論略〉，頁 747-753；馬靜茹，〈戚繼光鎮守薊鎮前後境遇的變化〉，《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2.1（無錫：2013），頁 74-80；張健榮，

體協助之過程、計畫內容和執行的折衝經過，故本文深入追查，藉以探究明朝邊防發生的轉變及隱含其間的明蒙關係變化。

戚繼光執行這場京邊軍事革新，常被置於明代政治演變中討論，如黃仁宇分析在明代財政軍制度的限制下，他已將專長和軍事改革做了最大程度的發揮。更多人聚焦於其軍事思想、陣法武器、練兵修臺等議題，如范中義分析戚氏的薊州軍事部署有三層次：偵察報警、擺邊防守、重兵堵截；童來喜通論他一生軍事經歷；還有論文集研究其兵書、家世、練兵、抗倭等項。[10] 這些著作各有所重，但戚繼光執行的京邊軍事革新計畫之主要措施、明廷的支持和監督、最後形成的新軍事制度，及更細部的對蒙戰略等議題，都還有待深究，亦為本文重點。

戚繼光駐守薊州期間，大力修築墩堡、置烽火、駐重兵，為秦朝之後最大規模的長城工程，明朝也擁有了鴨綠江至嘉峪關間的堅固防線，其中，山海關至居庸關段一千二百餘里和西延至保定北界的重城，合計三千座敵臺，留存至今。[11] 此段是京邊軍事革新計畫裡，明人與各蒙古「屬夷」部落往來貢市、偵探諜報的重要地帶。「屬夷」受明朝羈縻、領取撫賞銀，為游移在明朝和蒙古大汗間的重要緩衝勢力，積極爭取其支持，獲取蒙古內部準確情報，甚至援其為用，嚇阻蒙古主力入侵，是該計畫次要目標。明蒙關係得以從嘉靖朝的避戰受襲，轉為萬曆初在朝貢上採取「逆革順賞」的強勢態度，關鍵之一便是隆萬京邊軍事革新計畫，而「屬夷」的加強應用，更使明朝應對蒙古各部關係游刃有餘，相關議題，如明蒙的通貢、馬市、蒙古汗廷與迭興的強權、內附明朝的蒙部、明朝對於蒙古的軍事防禦等，均屬熱門，而游牧、農業民族的依存和競爭關係也備受關注，[12] 然而，這段關鍵改

〈薊鎮防務與戚繼光的軍事思想研究〉，《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1.2（三門峽：2012），頁 70-72；田然，《戚繼光戍薊方略及其對明蒙關係的影響》（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碩士論文，2018）；張姍姍，《明代薊鎮長城預警系統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碩士論文，2013）；常正勃，《戚繼光與薊鎮防務再探——以戚繼光與官員互動為視角》（呼和浩特：內蒙古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5）。

[10]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頁 205-247；范中義，《戚繼光傳》，頁 212-340；〈戚繼光在薊鎮〉，頁 9-47；童來喜，《戚繼光》；閻崇年主編，《戚繼光研究論集》（北京：知識出版社，1990）。

[11] 王國良編，《中國長城沿革考》，收入王挺之等編，《中國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歷史文獻叢書》第 2 冊（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1，景印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3 年印本），頁 2-20、2-23。

[12] 范中義等，《中國軍事通史．明代軍事史》下冊（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頁 633-636、745-752；趙文，〈明神宗“逆革順賞”策略對明蒙關係帶來的影響〉，《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3.5（武漢：2013），頁 56-59；孟凡云，〈論把漢那吉降明事件與“遠人請貢”〉，《民族研究》，8（北京：2008），頁 75-84；費克光 (Carney T. Fisher) 著，許敏譯，

革，特別是明軍對蒙古東部採取的圍堵、間諜等戰略，則少見研究，但其歷程，應足以解釋明蒙易勢之因，此亦本文可以貢獻之處。

二、京邊軍事革新計畫

明代京邊防衛區長二千里，以昌平鎮和薊州鎮為主；北側，原有大寧衛，於永樂二年 (1404) 改為「北平行都司」，內遷至保定，與真定衛併為「真保鎮」，同薊昌並守，原地被蒙古朵顏部進駐；東側遼東鎮，在明朝中期受蒙古侵擾之情遽增，凡此四鎮軍情，明朝均日落下風，必須增強防衛力，故隆慶、萬曆之際「天子徵兵集餉」的京邊軍事革新計畫，四鎮均在其中。[13]

隆慶元年 (1567) 十月，俺答犯山西，圖門汗（意同「萬歲汗」，又稱東虜、土蠻，全蒙古大汗，住牧察哈爾）伴隨犯薊州，蒙古東西兩部齊攻明朝。[14] 北京沿邊戒嚴，明廷商討機宜，陝西道御史李叔和、薊遼總督劉燾等，相繼舉薦搭檔多年、知兵善戰的兩廣總督譚綸 (1520-1577) 和福建總兵戚繼光出鎮薊州。十一月，譚綸獲任練兵兵部右侍郎，回部管事；戚繼光獲任神機營副將，訓練兵馬。[15] 次

〈論嘉靖時期 (1522-1567) 的明蒙關係〉，《民族譯叢》，6（北京：1990），頁 38-45；于默穎，《明蒙關係研究——以明蒙雙邊政策及明朝對蒙古的防禦為中心》（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博士論文，2004）；趙鑫華，《明蒙關係研究——以使臣為中心》（北京：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11）；Henry Serruys, “Mongols Ennobled during the Early M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2 (1959), pp. 209-260; Carney T. Fisher, “Smallpox, Salesmen, and Sectarians,” pp. 1-23.

[13] 劉效祖，《四鎮三關誌》，楊兆〈四鎮三關誌序〉，頁 2；卷 1，頁 49。

[14] 察哈爾是蒙古達延汗長子後裔游牧處，也是蒙古大汗所在。烏雲畢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編，《蒙古史綱要》（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頁 103、107。虜酋打來孫即土蠻之父。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10，頁 533；楊博，《楊襄毅公奏疏》，收入陳子龍編，《皇明經世文編》，《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65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明崇禎刻本），卷 277，〈責成薊昌遼保諸鎮邊臣及時修飭邊備疏〉，頁 198。戚祚國所稱之「土蠻」，應即達延汗玄孫——圖門汗。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6，頁 213。

[15]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6，頁 213、214；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11，「隆慶元年八月癸卯」，頁 13a；卷 13，「隆慶元年十月乙未」，頁 6b；卷 14，「隆慶元年十一月庚午」，頁 13a；「隆慶元年十一月庚辰」，頁 16a。譚綸於嘉靖三十七年 (1558) 任浙江台州府知府，閏七月升浙江按察司副使巡視海道；四十年回鄉守制；四十二年正月以原官起復，統浙兵 1,200 員負責剿倭寇，三月升福建巡撫。黃彰健等校刊，《明世宗實錄》，卷 462，「嘉靖三十七年閏七月戊寅」，頁 1b；卷 502，「嘉靖四十年十月庚午」，頁 3b-4a；卷 517，「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壬寅」，頁 3a-3b；卷 519，「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庚辰」，頁 1a。

年三月，譚綸到任，升兵部左侍郎兼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16] 與戚繼光共同擔負練兵和守衛北京之責。

練京營和防禦蒙古兩項新任務，規模遠大於戚繼光在南方所遭遇，為此，他也必須面對京師言官、北方將領，及人事部署上的各種牴觸。進京前，他先就北方軍情與譚綸相商，列出「五難」：

> 匈奴伺邊，往往不下數十萬，邊地凡數千里，備廣而力分。彼以全力而趣一軍，無堅不入，一難也。……匈奴控弦鐵騎，卷甲長驅，疾若飄風，士馬辟易不暇，二難也。中國所恃者，火器耳。北風高厲，胡塵蔽天，我當下風，火不得發，三難也。……匈奴所至無留行，去則鳥舉，終不可制，四難也。薊遼宣大藩衛京師，……列鎮相望，畫地守之，彼界此疆，不啻秦越，號令不一，烽堠不通，雖有聲援，鮮克有濟，五難也。[17]

針對五難，戚繼光認為須從邊郡新募兵，三千人為一旅，三旅為一部，每部車、騎、步兵兼有，合十部為一軍，再以教練浙兵之法更番訓練，三年後方可議戰。因需時甚久，言官必察，他籲請朝廷在練兵期間充分信任和授權，勿因一時邊情告急便群起督責，如此，才能期待非常之功。[18]

戚繼光知邊軍畏敵冒功，故陳請大舉練兵以矯治、募新兵以汰換。[19] 隆慶二年初，才到任，即請朝廷付他十萬大軍訓練，再散至九邊、京營，充作教練軍，帶動改善邊軍習氣，另請調來浙江舊部一萬助練，「分撥各將領赴各縣，同縣令募兵三千。即以縣令監督，以將領統之」，其〈請兵破虜四事疏〉則規劃長城九邊練兵事和相關府縣稅賦、人事、軍械諸政。[20]

戚氏計畫遭大臣疑慮「求望太過，志意太侈」，[21] 他本人則對「署都督同

---

[16] 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13，「隆慶元年十月乙未」，頁 6b；卷 14，「隆慶元年十一月庚午」，頁 13a；卷 18，「隆慶二年三月丙寅」，頁 12a。

[17]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6，頁 213。時為隆慶元年十月。

[18] 同前引，頁 213-214。

[19] 邊軍習性「虜未至而虛張賊勢以避罪，虜已退而虛稱斬獲以要功」。方孔炤，《全邊略記》，《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3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明崇禎刻本），卷 1，頁 225。

[20]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7，頁 215-218。

[21] 張居正，《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34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明萬曆四十年 (1612) 刻本），卷 21，〈與薊遼督撫〉，頁 94。

知、神機營副將」新職頗為失落，認為此職僅能訓練京營，該營豪貴充斥、法治難施，「安望其諳吾訓練而入吾彀率乎？」明廷因此在隆慶二年五月改授他「總理薊昌遼保練兵事務」，與薊遼總督譚綸共同節制四鎮。[22] 大學士張居正回覆譚綸私信時寫道：「今奉來教，知昔之所怏怏者，徒以削其總理舊銜耳。今既力為光復，更將何求？近屢得渠稟帖，極為感奮，頗務收拾人心，漸圖實事，仍望公時時督教之。」[23] 由此可知，戚繼光希望全權掌有一軍鎮，以己為中心練兵，明廷順其意授職，但要譚綸時加督導，張居正曾致信繼光，要其「以欽命為重，不在兵銜之有無，謙以自處」，才能博得文武支持。[24]

譚綸盱衡轄境，辨析薊昌練兵難處，改善戚氏計畫如下：

> 計薊昌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又分隸於諸將之手，……率畫地數丈而守一軍。虜數以十餘萬眾攻我一面，眾寡強弱，遠不相侔，欲虜勢不張，不可得也，故言者亟請練兵，……然臣以為，遊兵破虜誠為制禦長策，而行之有四難，……夫虜之長技在騎，而我制之非車不可，顧虜入動十餘萬，而吾即以車戰，不過三萬人，且此三萬人非有見伍，勢不得不召募，召募之兵與尺籍軍異，尺籍之軍無論老少強弱，餼廩豐給，優恤備至，調遣即有行糧草料；召募之兵非強壯不入選，既無素養之恩，有疾輒汰，又無歸老之計，既以車戰，亦無馬料，自非酌擬尺籍軍之食而稍優之，必不樂從，計三萬人宜各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司農告匱，是一難也。燕趙之士雖多慷慨，自備胡以來，銳氣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卒萬二千人雜教之，事必無成，此萬二千人者，臣與戚繼光召之可立至，用之可立效，教成之後，留之實邊，可使從者半散之歸農，可立遣無後憂，而時方疑其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虞其有他，是尚以臣與繼光不可信。夫不能信矣！尚能任之專哉？此二難也。軍旅之事務在威嚴，……燕趙之人素驕，驟見軍法，不無大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廢功，且釀他患，是三難也。我兵素未當虜戰而勝之，……不能戮力，……此四難也。臣熟思之，不如姑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除乘障應援者，皆如

[22]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7，頁 218、221。隆慶二年十一月，授戚繼光神機營副將一職。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14，「隆慶元年十一月庚辰」，頁 16a。

[23] 張居正，《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 21，〈與薊遼督撫〉，頁 94-95。

[24] 同前引，卷 28，〈答總兵戚南塘〉，頁 179。

故；昌平總兵所轄兵，亦就彼訓練如故；若臣標下兵二枝、振武營遊兵一枝、順天巡撫標下兵一枝、遵化遊兵一枝、薊鎮總兵標下兵二枝，又聽臣於大名、井陘二兵備道選民兵一枝，調真定遊擊下民兵一枝，真定府等府達官舍及各路防秋民兵中選一枝，共為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若尚不足，又聽臣於十路稍緩策應兵中選取，以足其數，可得兵三萬人，列為三營，營分為三軍：一營駐密雲、一營駐遵化，各用參將一員、遊擊一員；一營駐三屯營，中軍屬于總兵郭琥，左右二軍仍用參將、遊擊各一員，如法訓練，專備禦戰。仍付戚繼光以「總理薊遼保定等處練兵總兵官」之職，而命巡撫劉應節專任提調，臣實總督之。每遇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移近邊，密雲營屬密雲兵備副使；遵化營屬永平兵備僉事；三屯營屬薊州兵備參政，各隨營監督，而臣與應節、繼光往來督勵，小警自禦，大入併力，務各負牆以戰，遏之邊外，此為上策。[25]

譚綸將薊昌十區視為一體，希望足兵十萬，並規畫以車戰制蒙古騎兵，故需車營 30,000 員，選簿籍已有之兵與新募兵組成，但月薪加至 1.5 兩，年需銀 540,000 兩，支出巨大。其次，列名簿籍的在地兵驕惰質弱，須調來戚繼光南方慣戰舊部 12,000 員，雜居其間作教練，練成後，再將半數南兵遣散歸農。其三，就現有兵先練，盤點薊州鎮標、遊、民兵共十枝，使每枝滿 3,000 員，再分此 30,000 人為三軍，分駐密雲（密雲鎮）、遵化（永平鎮）、三屯營（薊州鎮），由總兵郭琥領中軍，專事防禦，新總兵戚繼光則專事薊州練兵。[26] 十枝先練軍內含 3,000 鳥銃手作衝鋒，由於練兵需時一年，趕不上本年度（隆慶二年）防秋日期，故先選 3,000 浙兵負責近三年的防秋任務，待邊軍練成後遣去。[27]

兵部支持譚綸的計畫，命戚繼光署都督同知、總理薊昌遼保練兵事，在譚之下

[25] 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20，「隆慶二年五月辛亥」，頁 1b-3a；收入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7，譚綸〈定廟謨以圖安攘疏略〉，頁 307-308。先練兵三萬，集薊鎮已有之兵十枝分駐密雲等三處，均由譚綸決定，戚繼光於〈定廟謨以圖安攘疏〉中將其原由寫得很清楚：「前條奏請兵疏，……四事上陳，比因眾見不協，該總督譚侍郎已釐二策：上策請兵三萬、中策加臣總理，訓練薊鎮……。」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7，頁 222。

[26] 隆慶元年十月，郭琥調任永平山海等處總兵。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13，「隆慶元年十月戊戌」，頁 7b。

[27] 同前引，卷 20，「隆慶二年五月辛亥」，頁 3a-3b。調浙兵赴薊，另一主因：「今糾集大兵，北人為多，而北方承平日久，軍法久未舉行，初集之眾一旦加以嚴刑，必有腹心爪牙以彈壓群情，此南兵之取不可已也」。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7，頁 219。

節制四鎮所有總、副、參、遊將領，府州縣官不得阻撓。募南兵上，兵部派二名錦衣衛官，持勑書、符驗、關防、旗牌赴浙，招募寧、紹、台、溫、金、衢等處鳥銃手 3,000 人，發善器、安家費，由杭嘉湖參將胡守仁、原參將李超督率至京防秋。銃手到鎮，每員給衣鞋銀 1 兩、日發銀 5 分，暫由太僕寺出資，再聽戶部研議「分立三營」事，譚、戚二人須詳議奏聞。[28]

譚綸隨後呈上〈分立三營事宜〉疏，定薊昌十路練兵三萬，分三大營：遵化、永平遊兵二枝，合巡撫標兵一枝，為遵化營，由巡撫都御史劉應節提督；建昌遊兵一枝，合鎮守標兵二枝，為三屯營，由總兵郭琥提督；振武、石匣二營，合總督標兵二枝，為密雲營，由練兵都督戚繼光提督。三營均加強戰備、攔截。遵化、三屯兩營，由戚繼光往來總理，受譚綸節制。[29]

計畫成形之際，監察也隨之而起。隆慶二年七月，巡按直隸御史劉翾、巡視山海關御史孫代彈劾戚繼光「欲以練兵事專責之總督，不令臣等與聞。夫臣等既受命閱視，則兵之練否，所宜糾察，而綸果於自用，逆折人口。」兵部、都察院諭譚、戚「稍寬以文法，廼得自展。」[30] 戚繼光則奏陳難處：

> 今各區守哨入衛之兵及巡撫、總兵標下兵，各守一方，勢不得總練，惟有總督標兵三枝付臣教練；浙兵三千分發十區，在臣標下者數百耳。臣無兵可練，何職之能條〔修〕？况官銜出於新設，邊將黨而不協，萬一有虞，百口何辯？願　陛下更予臣浙兵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或於西北招募，或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統領，車騎合練，軍中所需，皆宜處給。方今朝議紛嘵，難於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疑，請設監軍科道官一員以督臣，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31]

---

[28] 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20，「隆慶二年五月辛亥」，頁 3a-4a；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7，頁 221。

[29] 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21，「隆慶二年六月癸巳」，頁 4b-5a；譚綸，《譚襄敏公奏疏》，陳子龍編，《皇明經世文編》，卷 322，〈事疏〉，頁 686；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7，譚綸〈早定廟謨以圖安攘疏略〉，頁 308-309；劉堉纂修，傅修續纂修，（乾隆）《直隸遵化州志》，「中國方志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清乾隆五十九年 (1794) 刻本），卷 8，頁 2；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7，頁 222。

[30] 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22，「隆慶二年七月戊申朔」，頁 1a。

[31] 同前引，卷 28，「隆慶三年正月乙卯」，頁 3a-3b；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7，戚繼光〈請兵以備戰守疏略〉，頁 310-311。

他明言四鎮將領黨同不服調遣，自己麾下僅有譚綸交付的總督標兵三枝和數百浙兵，幾乎無兵可練。兵部詢問解決方案，譚綸認為薊鎮兵少，尚賴各鎮支援，宜先定練兵之說，稍後再召募自練，具體計畫如下述，於隆慶三年二月奏准。[32]

京邊軍事革新計畫第一部分，是助戚繼光樹立軍權，規劃如下。其一，令各路將領俱聽督撫授以兵法而練，實即聽令戚繼光，隨時罷換不從者。其二，增減副將以鞏固練兵權：提升建昌營遊擊一職為「協守東路副總兵」，由參將胡守仁出任，統領南兵，駐建昌營，分理松棚、太平、燕河、臺頭、石門、山海六營練兵事，含巡撫劉應節標兵在內，春秋兩防時齊赴建昌合練，專防燕山至石門；提升石匣營遊擊為「協守西路副總兵」，由參將李超出任，統領南兵，駐石匣、密雲，分理喜峰、馬蘭、牆子嶺、曹家寨、古北、石塘等路練兵事，含總督標兵在內，兩防時齊赴密雲訓練，專防牆、古、石三路；戚繼光任「薊州鎮營標兵」，駐三屯營訓練，專防馬蘭、松棚、太平三路；廢「古北口副總兵」，使薊鎮僅餘二員副總兵，統整事權。第二點變革在整頓薊鎮有兵近十五萬，卻僅半數堪用，且每垛守員僅二、三名又缺乏訓練的頹勢，致力簡化、汰弱增強。此後，到萬曆四年 (1576) 正月才又調整，割松棚、太平、喜峰、馬蘭四處，增設「中路副總兵」一員，駐三屯營城，形成薊昌練兵區內一帥三副總兵的架構。[33]

京邊軍事革新計畫第二部分，是以有限經費增募兵源，規劃如下：其一，薊州十二路修墩臺班軍數萬，每段工期騰出 6,000 員，交戚繼光訓練，用三年輪番練成精兵。不足 6,000 員，就從河南、山東京操軍內撥 3,000 人納入。其二，鎮巡官每五年一查本衛軍戶，均詳查正軍、略查餘丁，今改為若本戶軍亡，則從該百戶內照近例，僉取別餘補伍，並責令總兵每年比對應補、新解名額。其三，薊昌鎮、南北直隸各省逃軍，悉照舊規清補。其四，發每路將官募兵銀 300 兩、總兵 600 兩，聽其召募，每兵給衣甲器械銀 1.2 兩。其五，原領取各標下「行糧土著之民」費者，因不需修邊，故停發，轉充新兵，撥其中 10,000 員給戚繼光、3,000 員給楊四畏，充作標兵，加以訓練，餘員則補入督、撫標兵。[34]

京邊軍事革新計畫第三部分，是車、步、騎營合練，主要由戚繼光規劃如下：

---

[32] 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29，「隆慶三年二月戊子」，頁 6b、10b。

[33]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7，頁 228-231；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29，「隆慶三年二月戊子」，頁 6b-7a；《明神宗實錄》，卷 46，「萬曆四年正月己酉」，頁 7a-7b；譚綸，《譚襄敏公奏疏》，卷 322，〈條議戚繼光言兵事疏〉，頁 687。

[34] 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29，「隆慶三年二月戊子」，頁 7a-7b；譚綸，《譚襄敏公奏疏》，卷 322，〈條議戚繼光言兵事疏〉，頁 688。

練兵車七營，每營用 156 輛重車、256 輛輕車、4,000 步兵、3,000 騎兵、256 匹駕輕車馬。以東路副總兵一營合巡撫標下一營，駐建昌、遵化；以西路副總兵一營、總督標下一營，駐石匣、密雲；以薊鎮總兵二營，駐三屯；昌平總兵一營，駐昌平。薊昌十二路的七營車騎，以半合戰、半出奇戰法，在險地用騎兵、輕車迎擊，在易地則合用輕、重車騎，以戰車保衛長戟、火器，行則為陣、止則為營，預估能抗數萬蒙軍。[35]

京邊軍事革新計畫第四部分，是犒賞及兵車、火器費財源，規劃如下：其一，密雲縣庫貯之晉豫兩省折徵民兵犒賞銀，兵部原分給薊昌二鎮諸將，隨營犒賞，今以此費支持戚繼光練兵犒賞，年支銀 1,200 兩，副總兵各支 200 兩，不足則稍加，務求長遠可續。其二，兵車、火器，工部已給銀製造，不足數從犒賞銀盈餘取用。因現存盈餘僅數萬兩，故需隨時催山西有司繳納，避免虧空，並將各衛所的軍器料銀全留本鎮備用。[36]

練兵新增許多額外費用，均須從其他經費找補，如四月薊州新選忠順軍 2,000 名和保定、定州二營新增戰馬 600 匹的衣糧、芻料，照各邊主兵例，增列於戶部會計數內，但因隆慶三年度會計期已過，難復加派，戶部便先暫發太倉銀 14,470 兩一年，後命順天巡撫查轄下可動庫銀項目，各解往天津、易州倉貯用；不足，再從各省府京運銀內，改派民運補充。[37] 劇增的糧餉業務也超過原有人手負擔，順撫劉應節為此特請增加薊州管糧通判一員，駐遵化，以益邊務。[38]

隆慶三年二月，明廷批准計畫內容，調離總兵郭琥，改任戚繼光為「總理兼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督帥十二路軍戍事」，使其為轄內唯一總兵。四月，發「總理練兵事務兼鎮守薊州等處地方」關防一枚，命繼光主管一切練兵事宜，可調度、操演轄內所有官軍，文武官兵倘有抗命、阻撓以致失誤軍機者，准其呈報總督參奏處治。[39]

---

[35] 戚繼光的構想為「作戰時，事緩，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二十里，車步八十里；事急，騎兵晝夜須行一百五十里，車步一百里。皆以調兵文到為始，失期誤事、邏卒探報不實者，悉按軍法無赦。」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29，「隆慶三年二月戊子」，頁 8a-8b、9b-10a；譚綸，《譚襄敏公奏疏》，卷 322，〈條議戚繼光言兵事疏〉，頁 688-690；劉靖纂修，（乾隆）《直隸遵化州志》，卷 19，頁 6-7。

[36] 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29，「隆慶三年二月戊子」，頁 8b-9a；譚綸，《譚襄敏公奏疏》，卷 322，〈條議戚繼光言兵事疏〉，頁 689。

[37] 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31，「隆慶三年四月辛丑」，頁 8b。

[38] 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7，劉應節〈請增薊州管糧通判疏略〉，頁 315。

[39]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8，頁 241；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31，「隆慶三年四月辛丑」，頁 8b；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7，〈勑諭署都督同知戚繼光總理練兵〉、

三、薊昌遼保軍事改革與隆慶大閱兵

隆慶三年 (1569) 二月，「京邊軍事革新計畫」起行，由於薊州鎮以北、真保鎮以西諸山勢不足恃，薊鎮屬夷之兀良哈三衛又有異心，故修築城防首先展開。[40]

薊昌遼保十二路二千四百餘里長城，東起山海關、西至鎮邊城，譚綸預計年修千座墩臺，每座工銀 50 兩（後量增為 80-100 兩／座），高 3 丈、寬 12 丈，內容 50 人，瞭望兼作兵卒住所，專事對付蒙兵聚攻。兵部削減其數，准築 1,200 臺，連續三年發太倉銀 35,000 兩、兵部馬價銀 15,000 兩支應工費。[41] 戚繼光採用先前在浙江築空心敵臺之法，抗擊物議，合眾官兵之力，[42] 循薊遼山勢夯土為城、包磚強化，至五年八月城工告竣，兵部稱「自庚戌來，先後邊臣止議築墻而不及修臺，故虜至輒得氣去。今十四路樓堞相望，二千里聲勢相援，皆督撫官協謀任事之功」。[43] 計隆慶二年至萬曆初年，薊遼昌保四鎮櫛比鱗次新增千餘座空心敵臺，遼東邊牆也紛予包磚，城防堅實度遠勝嘉靖時期。[44]

城工開啟甫半年，戚繼光便促請練兵，稱「守固以築臺為策，而戰必以練兵為先」，因為此乃計畫之核心。他期能抽出部分兵馬，先行每月操練一日，[45] 並分析戰略如下：

〈勑諭署都督同知戚繼光總理兼鎮守薊鎮〉、〈制諭署都督同知戚繼光〉、〈勑總理練兵事務兼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總兵官右都督戚繼光節制客兵〉、〈勑總理練兵總兵官左都督戚繼光整飭練兵〉，頁 236-238。

40 薊鎮山勢及巡邊大臣鄭大經的相關評論、請修關隘城防，參見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2，頁 58、61；卷 7，鄭大經〈請行邊大臣經略薊昌關隘疏略〉，頁 303。屬夷促人要賞，乘間為盜，忠誠不足，參見張居正，《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 28，〈答閱邊郜文川言戰守攻閥〉，頁 186。

41 《戚少保年譜耆編》記載戚繼光請銀 150,000 兩，應即譚綸所請之三年工費數額，但最終准築臺數為 1,200 臺。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29，「隆慶三年二月癸未」，頁 4a-4b；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7，譚綸〈請建空心臺疏略〉、〈防秋事竣敵臺工完疏略〉，頁 311、317；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8，頁 241。

42 參與築臺堡的官將，見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42，「隆慶四年二月丙寅」，頁 15b；兵科都給事中溫純彈劾築臺「費亦不貲」，見同前引，卷 47，「隆慶四年七月丁丑」，頁 5a。北京長城仿自浙江臨海，型制非常接近，且留存至今，參盧如平，〈明長城的 “師範” 和 “藍本”——台州府城牆的特色與價值研究〉，《台州學院學報》，33.4（台州：2011），頁 10-13。

43 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60，「隆慶五年八月庚戌」，頁 6a。

44 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2，頁 64-84；卷 7，汪道昆〈創築空心敵臺疏略〉，頁 384。

45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8，頁 247。

> 數十年前屬夷，未有西虜之時，聽我指揮，……撫賞既省，驅之所向，無不如意，即定期以行賞可也，分關以伺賞亦可也。自與西虜結親之後，屢導入犯，……近來，將領務增額賞，以各顧自己地方無事，即拿人鄰境若罔聞知，……合無先練強兵，或虜至攻牆，戰退一二次，使不得入；或於口外決戰、或入犯大戰一次，必我得全勝，北虜膽奪，屬夷失怙，然後任我撫賞，無有不利矣！[46]

他認為明朝主要敵人是西虜——俺答，次要敵人是薊遼屬夷——兀良哈三衛，而明軍內憂在各區將領只圖自顧、倚賴撫賞銀賄敵，故須儘早練兵，重整部隊，再正面迎戰蒙古，徹底挫敗其力，然後重行撫賞安邊，才是正途。

此時，浙江三千舊部已到薊州教練示範，助戚繼光震服官兵。他針對蒙軍慣於大舉入侵單點習性，調整各路明軍互援順序，明定權責，提升作戰效率；其次，建營房，存戰車，兼作客兵住所，提升助戰力；其三，循用仁宣之後，明朝官將因應長城「有重兵、乏敵情」狀況的固有對策：增加哨探，蒐集情報，以遠哨外夷為第一等、墩烽得報為第二等，賞罰分明。[47] 迄隆慶五年八月，練兵見效，南兵添調逐漸減少；[48] 十月，戚繼光從萬員南兵中選精銳編入衛兵，策應主兵，並要求戍守各臺的千、把、百總各選隨身器械一件，如刀槍棍棒等，與南兵一體演習、考教武藝，列入賞罰。[49]

練兵期間，明廷致力保持京邊人事平穩，不使軍務中斷。隆慶四年十月，譚綸升兵部左侍郎，返京協理京營戎政，由與戚繼光已共事兩年餘的順天巡撫劉應節 (?-1591) 接任薊遼保定總督，[50] 他擅長查找、融通經費，簡化後勤手續，對練兵助益甚大。劉應節曾協助者，如南兵經費不在隆慶五年會計數內，他便奏請戶部商借太倉銀支應；積極回應御史提案的糧餉處置事宜，報准戶部，依薊密永平各鎮之軍事配給、物價、物資充盈度差異，調整發放實物或銀兩，並准許各經費項目間互

---

[46] 同前引，頁 226-227。「西虜」俺答為隆慶、萬曆的最大邊患，其次是遼東鎮外的「東虜」圖門汗等三支勢力，兀良哈三衛則連結他們，作其嚮導，入犯薊昌。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10，頁 532-533。

[47]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8，頁 241-244；馬楚堅，〈明代搪報之創生及其編制〉，《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17（香港：1986），頁 212-213。

[48] 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60，「隆慶五年八月戊午」，頁 9a。

[49]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9，頁 293。

[50] 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47，「隆慶四年七月乙亥」，頁 4a；卷 50，「隆慶四年十月甲辰」，頁 6b。

相融通，省去召買費用；適時出售軍倉陳米、換新米，通令薊遼周邊州縣就近輸納數十萬稅糧、馬草，以免召商折賣成銀之損。[51] 這些武官不擅長之處，均由文官統籌帷幄。

戚繼光用浙兵練兵，是舉朝注目與嚴格監督之事。隆慶五年七月，不少大臣認為薊昌二鎮「守墻為怯」，大學士高拱等遂決議，次年十月後，將派員閱視薊遼保定三鎮與宣大七鎮，查察軍事進展（「隆慶大閱兵」緣由）。御史余希周 (1536-?) 針對浙兵，建議清勾魯、豫、晉、陝、兩直隸的逃軍，與各省應發邊衛充軍者，全數改發薊昌，以減少他處入衛薊州的客兵費用，並送返懷鄉浙兵，再從浙募新人，補足 9,000 浙兵之數。隆慶六年初，御史杜化中、給事中涂夢桂接連彈劾繼光遣率浙兵赴薊的福建參將王如龍等，藉勢中飽私囊，幸而僅罪實犯者，未波及繼光。浙（南）兵也排擠到薊州經費，為供其餉，劉應節奏請「南兵添一名則邊兵減一名，即以邊兵糧草作為南兵工食」，並停止山東民兵入衛，改為一年一兵折銀 24 兩送薊，隆慶六年固原 2,500 兵亦免來；順天巡撫楊兆則檢核亡逃鎮兵名數，理清實存兵數，省出費用供應南兵。[52]

戚繼光在北邊負責實務最廣、實權最大，也備受矚目。隆慶末，薊遼總督劉應節，駐密雲；順天巡撫楊兆，駐遵化，兩人平時各自往來督理諸路軍務，遇警報則隨營調度。薊州、昌平、密雲到山海關，總長 2,017 里，分十四路：昌平鎮三路——邊長 460 里，由總兵楊四畏鎮守，兵備僉事張廷弼整飭地方。薊州鎮十一路——邊長 1,557 里，由總兵戚繼光鎮守，其下石塘嶺、古北口、曹家寨、墻子嶺四路 654 里，屬副總兵張臣協守、兵備副使王一鶚整飭地方；馬蘭谷、松棚谷、太

[51] 御史傅孟春陳報〈折支積貯事宜〉，劉應節積極研議，報准戶部，令各鎮立下定則：米每一石折銀七錢，秋冬軍米照舊例，全數折銀支給，春夏應該支本色米的，則酌量改折成現銀發放，並依里程和物資充盈度分劃，如薊州鎮漕、屯、鹽、糧均有；密雲人眾地狹，米價貴；永平只有民、屯糧，但米價常平，便各依其特性，將原該運至各營的米，依不同的月數折支成銀發放。折色、本色米、客兵銀互相融通，省去召買費用；薊密倉米積至二十萬石、永平至十五萬石，便會賣出陳米、換新米；順天、永平兩府的緣邊州縣有數十萬送往北京的稅糧、馬草，為避免召商折賣成銀的損失，改令就近輸納。同前引，卷 55，「隆慶五年三月庚辰」，頁 8a；卷 56，「隆慶五年四月乙未」，頁 2a；卷 60，「隆慶五年八月辛亥」，頁 6b-7a。
劉應節支持戚繼光在軍務上的各項需求，包括供應大量火器，確實達到蒙古不敢入犯的效果。王納言修，石邦政纂，（隆慶）《豐潤縣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01 冊（臺南：莊嚴文化，1996，明隆慶四年 (1570) 刻本），卷 2，頁 437。

[52] 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59，「隆慶五年七月己丑」，頁 10a-10b；卷 60，「隆慶五年八月戊午」，頁 9a-9b；卷 65，「隆慶六年正月癸未」，頁 8a-8b；卷 67，「隆慶六年閏二月甲戌」，頁 6a-6b；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7，劉應節〈申明支糧事例以便查盤疏略〉、楊兆〈校覈鎮兵以稍裕軍儲疏略〉，頁 326、330。

平寨三路 457 里，馬蘭一路屬張臣協守，松棚、太平二路屬副總兵史剛協守；燕河營、臺頭營、石門寨、山海關四路 446 里，屬史剛協守、兵備副使孫應元整飭地方。實際上，隆慶二年十月，戚繼光已將薊州十一路依遠近改為十二路，每路置一名將領，統 3,000 兵。[53]

隆慶五年後期，京邊各路軍區整頓有成，哨探密布，布署漸具規模，浙兵也固定為 9,000 人，分散於薊州、永平、密雲三鎮，年需餉銀 162,000 兩仍屬編制外，由總督劉應節另行籌措，延綏、固原等處兵馬及山東民兵因此奏免入衛，以省費用。[54] 薊州十二路軍區負責哨探的蒙古屬夷居所，交錯重疊，形成綿密的情報網，也是革新之處，顯現明軍盡力偵知敵情的布置：[55] 石塘嶺、古北口、曹家寨的哨探重點是俺答（西虜）；石門寨、臺頭營、燕河營、太平寨的哨探重點是圖門汗（東虜）；其他區的哨探亦負責監視這兩股主要外敵的動向。戚繼光對哨探採厚賞重罰制，務求真情報，並規定各營均以地名為名，不稱某衙門標下，避免人情危害軍令。[56]

隆慶年間，京邊大幅翻修城臺、補換器械、明定官兵權責，並不斷募換浙兵示範教練，改革甚急。戚繼光駐薊州三屯營指揮全局，至萬曆四年 (1576) 始重修該營城，置遷安縣，兩年後，新城可容九千餘兵，又重修其南 120 里、原隸遵化縣的忠義中衛故地，改隸遷安縣，以強化居庸、山海兩關間的隘口守備。[57] 戰馬方

---

[53] 黃彰健等校刊，《明神宗實錄》，卷 3，「隆慶六年七月庚子」，頁 17a-17b；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7，頁 231。薊遼昌保總督駐密雲始自庚戌之變後的嘉靖三十一年，順天巡撫駐遵化，隆萬時期均為定制。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6，頁 172、200；卷 8，頁 426、4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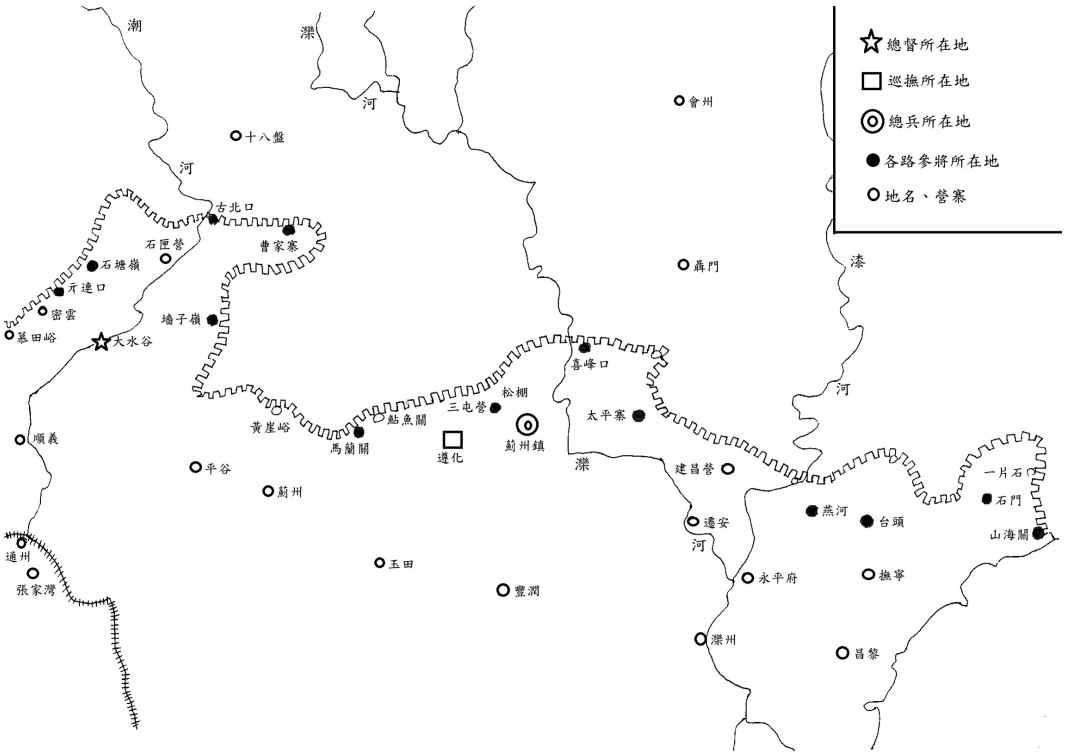
[54] 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69，「隆慶六年四月癸未」，頁 9a。浙兵，又稱浙薊南兵，並未散入各營，而是自成營伍，總計六枝，三年一換回鄉。如萬曆四年正月中旬，薊州鎮中路南兵由一名遊擊將軍，押至張家灣搭船赴杭州，參加浙省春汛防衛；五月初旬，該遊擊再督兵 2,000 員從北新關航返張家灣，於德州補給行糧，限七月底前到薊，在密雲過堂，來回程之兵數都須足 2,000 員，人數不足時，兵員可重複。萬曆五年輪薊鎮西路南兵返杭，時間、員數、行程等，均同前一年。薊州鎮共有東路、中路、西路南兵副總兵公署三處，分居燕河營城、漢兒莊城、石匣營城，均由密雲縣的薊遼總督府直轄。至隆慶五年，薊州等鎮南兵共 9,000 員。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7，〈勑東路南兵參將楊文〉、〈勑中路南兵遊擊楊瑄〉、劉應節〈議處南兵糧餉疏略〉，頁 246-247、326-327；卷 8，頁 426-427。

[55]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9，頁 290-292。該年譜中，直到隆慶五年八月，才列出十二軍區詳細規劃。

[56] 同前引，頁 292；卷 12，頁 346。

[57] 天順二年 (1458)，薊州總兵胡鏞移薊州衛城於三屯營，並修築周 800 丈的城牆，戚繼光任薊鎮總理總兵時駐此，因其殘破，加修 557 丈，總長為 1173 丈，即周 7 里，但薊州衛的衛城是薊州城。潘秀華，〈薊鎮古城三屯營探論〉，《萬里長城》，4（北京：2011），頁 14-17；孔維媛，《三屯營城空間演變研究》（天津：天津大學碩士論文，2017），頁 2、22、29-33；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6，頁 172；卷 8，頁 426、427。萬曆四年起修三屯營，參見方孔炤，《全邊略

面，一直有倒死問題，迄隆慶末，年耗銀 49,680 餘兩，均非常例銀，都由總督另行籌措。[58] 戚繼光練兵、革新軍事，歷任薊遼督撫監督和支援行政，便成為隆慶時京邊的常年模式。薊州鎮各關隘，參見圖一。



圖一：薊州鎮形勢圖[59]

「京邊軍事革新計畫」嘗試改革明朝傳統軍制，牽動諸多政府部門，新措施、新編制，如重劃軍區、募換浙兵等，都屬非常規、額外，且在京邊練兵達四鎮數萬眾，都使該計畫備受監督，時遭批評，晚至隆慶五年八月，改革見效，仍遭「守墻為怯」質疑。是故，明廷決議對北邊軍事進行一次總檢覈，以查察對於薊昌的大量供給、行政通融，是否確實提升軍力，「隆慶大閱兵」於焉展開。[60]

記》，卷 1，頁 225。

58 黃彰健等校刊，《明神宗實錄》，卷 5，「隆慶六年九月甲申」，頁 1a-1b；卷 6，「隆慶六年十月辛酉」，頁 6b-7a。薊遼總督劉應節曾向兵部請過一次非常例的 30,000 兩馬價銀。

59 范中義，《戚繼光傳》，頁 309。

60 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59，「隆慶五年七月己丑」，頁 9b-10a；《明神宗實錄》，卷 5，「隆慶六年九月壬子」，頁 10a。

隆慶六年九月，兵部侍郎王遴等出巡長城邊鎮，其中，戚繼光舊友——右侍郎汪道昆 (1525-1593)，負責檢視薊遼。[61] 為此，戚繼光訂立〈合練約法〉，於十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十九日進行大演習，齊集薊昌十二路軍區十六萬兵馬，分派各路車營、主客兵馬任務，實操衝鋒、布陣、舉烽火等務，讓汪道昆及督撫劉應節、楊兆等驗收練兵成果。當時，京邊 2,400 里長城 1,200 餘臺全數修畢，每臺均有 20 名戍卒，三個時辰內烽火可傳全線，車、馬營各增至十營，繼光另報：九邊共計六十萬員，是蒙古大汗及俺答等部人數的兩倍。汪道昆對演習讚許非常，代表朝廷大行宴賞。[62]

不過，大閱兵期間，薊遼督撫劉應節、楊兆籲請從寬給費，戶部卻提出質疑和建議，並獲得詔旨稱是。其意見如下：

> 九年〔邊〕年例共計二百八十餘萬，薊鎮歲該八十餘萬，主兵十萬，每年發銀一十六萬四千九百餘兩，今既逃亡三萬有餘，自當勾補。本部原題，正欲以勾補逃亡求充額數，非于年例數內再欲減削也。客兵會計，入衛邊兵及民兵、班兵，每年發銀七十餘萬，今在密鎮加至十三萬有零，永鎮加至一萬二千零，該鎮原議專練南兵，以減退客兵，將減退客兵之糧以養南兵，今稱減去三萬有餘，又增發太倉銀一萬七千四百兩，是客兵雖有增減而客餉實則有增無減也，是以督撫疏以軍人之離伍甚多，當核其實數。……如先年專遣憲臣，實滋煩費。查得兵部右侍郎汪道昆閱視在邇，先該閣擬以查理錢糧為首，相應會同督撫悉心查議。隆慶四年，總督分布各路主兵八萬五千餘兵，今奏稱一十一萬，的係何據？逃軍三萬併改撥不下萬人，原餉有無開除？即今清解、頂補，原餉有無勾用？練募奇兵，串營、遊食之徒作何議處？客兵、班兵何日可議罷？即有應增、應減兵馬，須與本部年例銀兩通融會計，不得過于原數，務使兵食俱足，乃為經久可行。[63]

---

[61] 黃彰健等校刊，《明神宗實錄》，卷 6，「隆慶六年十月己未」，頁 3b。

[62]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10，頁 302-317，軍員數字等見頁 43、45；戚繼光，《練兵雜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72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清乾隆四十六年 (1781) 校本），卷 6，〈烽堠解〉，頁 765；朱澤，〈詩劍之交：記汪道昆、戚繼光的友誼片段〉，《安徽史學》，5（合肥：1984），頁 32-38。

[63] 黃彰健等校刊，《明神宗實錄》，卷 6，「隆慶六年十月壬戌」，頁 7a-7b。

由上可知，薊昌年用占九邊經費近三成 (80/280)，定額主兵十萬員中，逃亡三萬多員，戶部已從寬處理，僅要求督撫勾補新兵、填實員額，並未順勢削減經費。此外，密雲、永平鎮客兵經費已增，但「客餉」項目上卻無督撫報稱的「減退客兵」、「以養南〔浙〕兵」、已減銀三萬餘兩，又隆慶四年總督報薊昌主兵八萬五千餘員，六年大閱兵當下報有十一萬員，戚繼光則稱十六萬兵馬，何者為真？督撫未言，故戶部要求薊昌官將核實數額，確實做好勾補缺員、停罷適量客兵、汰除遊食冗員等作業，與部定年例銀「通融會計」，勿超原額。[64] 顯見京邊軍事革新在諸多細節上，也不盡完美。

侍郎汪道昆部分贊同戶部，稱：「薊昌二鎮捍衛陵京，其地視各邊為重，然兵制甚疏、兵力甚弱。」[65] 但他認為譚綸、戚繼光已將北軍振衰起敝，勝於嘉靖庚戌之變時，達成「戊辰〔隆慶二年〕以後，虜未敢犯薊昌」的效果，[66] 此際要求減兵縮餉，不啻苛求。他從「京邊軍事革新計畫」本即試行這點出發，認為「邊長地重，安能去兵？師行糧從，義安能去食？因地之緩急以計兵，因兵之多寡以計食，因經制之未備者以計萬全，三者相須，非有定額不可。」[67] 奏請明廷將該計畫作法融入制度，形成新的定制定額。他詳細籌畫薊昌一切主客兵馬糧料事宜，提出「薊昌經制」，呈報戶、兵二部，請自萬曆元年起，薊遼昌保四鎮均準此制行事，改善無定額、年年機動調整之不便。[68]

萬曆元年五月，戶、兵二部以汪氏「薊昌經制」嚴密可行，決議依此施行，形成定制，但也鄭重要求，四鎮既遵新制，往後各項軍費不許再議增減。此舉宣告「京邊軍事革新計畫」經四年試行有成，被引為新制度，供往後軍務參照，[69] 並

---

[64] 譚綸京邊軍事革新計畫下的「清軍」原則是：「通將所轄邊鎮各區分守并標遊等兵，各造清冊三本，內係邊發抽垛者，將應繼弟男不拘隨伍、原衛，俱開報的名，各附造本軍名下，以後遇缺，據籍頂補，不必再用清勾；係召募者，該管官員按季開報，止給與募軍銀二兩。」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7，〈勑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賀一桂〉，頁 232。

[65] 黃彰健等校刊，《明神宗實錄》，卷 11，「萬曆元年三月甲午」，頁 5a。

[66] 同前引。

[67] 同前引，頁 5a-5b。

[68] 同前引；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凡例，頁 10；卷 7，汪道昆〈定議昌薊兵馬錢糧額疏〉，頁 335-338。

[69] 經戶兵兩部議覆，詔令核准之汪道昆版之薊昌新軍事制度主要如下：1. 兩鎮定額兵 165,642 員、馬騾 61,146 匹，定額餉 1,658,938 兩。2. 減遵化民壯 3,000 名，改徵銀 18,000 兩送順天巡撫衙門，轉發薊州道貯作軍儲。3. 減山東民兵和入衛薊昌的遼兵各 3,000 名，省下經費供薊鎮軍儲。4. 山海附石門共十路軍，每路設一車營、昌平三路軍共設一車營。密雲、遵化、三屯設三輜重營。5. 革昌平鎮將官支關稅并家丁名額。6. 昌平鎮物價貴，宜委官赴通灣等處收買運積，以備急用。由關稅支給，勿支軍餉。7. 民運銀兩，除直隸催解總督衙門，其河南、山東共銀 420,000 兩及山東

新定監察方式：每年底，邊鎮須將收支過的兵馬數目，備細造冊送部，以糾正昔時無紀錄可考之弊。[70] 萬曆元年起，依汪道昆方案所定四鎮兵額如表一。

表一：萬曆元年薊遼昌保四鎮主客兵定額（版籍）與糧餉數[71]

鎮 / 兵屬	薊州鎮	昌平鎮	真保鎮	遼東鎮
主兵（員額）	73,562	17,744	34,460	94,045
客兵（員額）	57,573	13,179	19,843	—
每年民運糧餉（銀兩）	261,569.1	135,803.3	471,792.735	150,710.9
每年京帑糧餉（銀兩）	915,629.5	60,000-120,000	59,000	163,998.53
每年民運糧餉（實物）	豆 70,145 石 草 720,938 束	—	另計	另計
每年京帑糧餉（實物）	米 254,810 石	漕米 189,272 石	—	—

「隆慶大閱兵」是明廷全面視察北邊軍務之舉，但邊鎮為此舉行大演習者，僅有薊昌十二路，顯見是戚繼光有意為之，一向朝廷展示練兵成果，證明錢糧並未虛耗，兼釋眾臣之疑；二向蒙古耀武揚威，懾敵安邊。這場演習顯示出，京邊軍事革新計畫已經可以從「安內」進一步擴大到「攘外」，即將軍事目光轉移到直接對蒙古各部施行各項戰略。

四、萬曆時期薊遼地區對蒙古東部的圍堵戰略

隆慶時期的京邊軍事革新，在張居正主導下，主要在強化明軍的防禦力和邊防建設，核心在「外示羈縻，內修戰守」，威懾蒙古使不敢入侵。萬曆初期，雖然續採「守」字訣，以拱衛陵京為上，避免明蒙間的大規模武裝衝突，但已經將守勢的

改徵民兵工食銀 56,000 兩，都改徵解到太倉再轉發到本鎮。8. 每年終，督撫等衙門備查各鎮扣除數，以餘額支應新年度需求。黃彰健等校刊，《明神宗實錄》，卷 13，「萬曆元年五月戊戌」，頁 7b-10a。

[70] 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7，〈勑薊州兵備山西布政司右參議兼僉事王之弼協理糧餉〉，頁 234。

[71] 同前引，卷 3，頁 85-88；卷 4，頁 111-119。汪道昆之奏成為「今制」，即：薊遼昌保總督一員，駐密雲、順天巡撫一員，駐遵化、保定巡撫一員，駐真定、遼東巡撫一員，駐廣寧，每年另有行邊大臣到各鎮查覈、紀驗。同前引，卷 6，頁 172、200、205、211；卷 7，〈勑總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兆〉，頁 229。

力道和範圍，從「整頓薊昌內務」擴大到「聯合薊遼外拒強敵」，並加強「屬夷」與「哨探」的應用，深入敵營，以輔助薊遼地區的圍堵戰略：沿薊遼—遼西連線置兵，阻截蒙古入侵。[72] 戚繼光啣此託付，憑藉隆慶時的城防建設與練兵之功，多次成功阻敵於薊州、昌平境外。

萬曆元年 (1573)，明蒙在京邊的數次衝突，均以蒙軍敗走或難以近邊作結。[73] 薊遼沿線軍事將領們：山海總兵戚繼光、昌平總兵楊四畏、遼東總兵李成梁、保定總兵傅津，因傑出的守禦表現，獲兩任薊遼總督劉應節、楊兆相繼題請特賜殊寵。[74] 足見萬曆初期之京邊軍事革新，主角已非薊州鎮的戚繼光，而是擴大到薊遼連線的所有軍鎮，此從持續擴充軍械一事可見端倪。萬曆二年三月，總督劉應節奏討火器，工部回覆：

> 查得京庫廠局收貯火器，專備防護都城，聽京營官軍閱領，例不發邊。獨該鎮密邇京師，自隆慶元年以後，破格量發數次，今仍于盔甲廠動支見貯鐵佛朗機二千架、鳥銃四百副、夾把鎗二千桿并各隨用子銃、鉛彈、火藥、藥線等項，聽差官領回。其兵仗局題，欲添造合成造中樣銅佛朗機銃三千副、大將軍十位、二將軍七十九位、三將軍二十位、神炮六百六十九箇、神銃一千五百五十八把，補造中樣銅佛朗機銃一千二百副、小銅佛朗機銃五十副〔又有作五千副〕并各隨用子銃、鉛彈、火藥等項，定限三年之內盡數報完。[75]

---

[72] 張居正告訴郜光先：「大抵薊鎮之勢與他鎮不同，……此地原非邊鎮，切近陵寢，故在他鎮以戰為守，此地以守為守；在他鎮以能殺賊為功，而此地以賊不入為功。」張居正，《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 28，〈答閱邊郜文川言戰守攻閥〉，頁 186。張居正告誡戚繼光：「今日之事，但當以拒守為主，賊不得入，即為上功。薊門無事，則足下之事已畢，援遼非其所急也。」同前引，卷 32，〈答總兵戚南塘授擊土蠻之策〉，頁 249；趙英、鍾少異，〈張居正北部邊備思想研究〉，《國防》，2（北京：2019），頁 80-85。

[73] 三月，永平鎮堵截蒙軍成功；六月，界嶺口、桃林口挫敗蒙軍；六、七月間義院口、窟窿臺等處客兵換防，蒙軍入襲遭到頑抗，難以近邊。黃彰健等校刊，《明神宗實錄》，卷 11，「萬曆元年三月丙午」，頁 9a；卷 14，「萬曆元年六月辛未」，頁 7a；卷 17，「萬曆元年九月癸卯」，頁 10a；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11，頁 323-324。

[74] 黃彰健等校刊，《明神宗實錄》，卷 21，「萬曆二年正月辛卯」，頁 6a；卷 31，「萬曆二年十一月辛未朔」，頁 1a；卷 46，「萬曆四年正月庚申」，頁 16a。隆慶五年八月似為分水嶺，薊州諸事步上軌道，譚綸也離任薊遼總督，由劉應節接替。黃彰健等校刊，《明穆宗實錄》，卷 60，「隆慶五年八月戊午」，頁 9a-9b。

[75] 黃彰健等校刊，《明神宗實錄》，卷 23，「萬曆二年三月辛丑」，頁 8a-8b。

從工部文可知，隆慶時，明廷將原來僅供京營使用、從不外發的京庫火器，數次「破格量發」給薊昌諸鎮，目的當然是整頓軍事，今既練兵有成，仍自萬曆二年起，再連續三年供應庫存武器，甚至准許報銷、添造器械，可證明廷並未停止強化京邊守衛力量的腳步。

萬曆二年七月，順天巡撫楊兆 (1528-1587) 接替劉應節，升薊遼總督，持續擴充軍備。[76] 次年二月，他請兵部為已修成的 1,337 座臺堡，每座發十架佛郎機、千枝火箭、戰車及火器，而薊昌的戰車、輜重車十六營，[77] 則搭配地雷使用，設置如下：

> 沿邊臺牆之下，擇其平廣、虜可集處，掘地，埋石礮於內，中置一木匣，各礮之信總貫於匣中，而匣底叢以火藥，中藏鋼輪，兼置火石於傍而伏於地上。虜馬躡其機則鋼輪動轉，火從匣中出，諸礮並舉，虜不知其所自。[78]

薊昌防衛至此達於鼎盛，明軍採守勢以逸待勞，強化防務，蒙古難越雷池，大者如萬曆八年十月，十餘萬騎犯錦州、義州，即因臺堡堅實而退，小者更多。[79] 大將戚繼光等，則每秋例行誓師，以振軍心。[80]

隨著京邊軍情穩定，遼東防務也日形重要，明朝漸加強此處部署，與薊昌形成圍堵蒙古之勢。遼東鎮魚米可自給，但旅順海運久已湮廢，物資供應不足，遼西各堡單線防守，體態甚虛，故薊遼總督楊兆先務厚植軍力，向戶部請准，發給遼寧寬奠子等六堡每兵五十畝地，聽其墾種，永不科稅，迄萬曆五年底梁夢龍 (1527-1602) 接任時續行。[81]

---

[76] 同前引，卷 27，「萬曆二年七月庚寅、癸巳」，頁 7a。

[77] 每臺的武器有神快鎗、鳥銃、夾靶銃和子銃、鐵閂、錘、剪、錐、送子、鉛子、火藥、炸藥、火繩，馬步援兵用虎蹲大砲、鳥銃、快鎗、鉛藥，一般兵用腰刀、弓箭、鑭鈀等。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11，頁 325。

[78] 同前引，卷 12，頁 342。

[79] 黃彰健等校刊，《明神宗實錄》，卷 105，「萬曆八年十月己酉」，頁 3a-3b。

[80]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12，頁 343、345。

[81] 劉應節、楊兆奏陳遼東邊務甚多。黃彰健等校刊，《明神宗實錄》，卷 28，「萬曆二年八月甲寅」，頁 4b-5a；卷 28，「萬曆二年八月壬戌」，頁 6b-7a；卷 30，「萬曆二年十月丁巳」，頁 4a；卷 31，「萬曆二年十一月丙子」，頁 2a；卷 34，「萬曆三年正月庚申」，頁 5a。寬奠子事，參同前引，卷 70，「萬曆五年十二月庚子、癸卯」，頁 5a-6a。楊兆升南京刑部尚書，梁夢龍接任薊遼總督；遼東情況，參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2，頁 63。

「屬夷」和「哨探」兩利器，是京邊軍事革新計畫起始便很注重的細部項目，也廣行於薊遼關外。屬夷，是住牧關外、向明朝稱臣的部落，薊遼區大者是兀良哈三衛，元末投降明朝，計有 46,000 戶 448,000 人，洪武二十二年 (1389) 於其橫水之北居地——兀良哈設置朵顏、福餘、泰寧三衛。永樂元年 (1403)，明朝大寧都司南遷保定，大寧地遂為三衛蒙人所占；三年起，三衛每年入貢，領取撫賞銀，作明朝前線哨探，世代相承，獲准與遼東商人互市，同於建州女真；成化時，遼東甚至月月有馬市。萬曆四年，福餘衛頭目那顏孛來報訊有功，明朝升其為都指揮僉事，准許兀魯罕等衛都督、都指揮之孫輩襲爵，換發勑書，延續撫賞資格；夷人來降、被擄華人投歸，則計口收容，建館居養，願回原籍者聽，無家者分發各營操備。[82] 戚繼光言：「寄耳目於屬夷，委腹心於偵探」，透過屬夷，偵知蒙古各部訊息，復以熟稔蒙情蒙語的哨探辨別其言真偽，是一重要戰策。[83]

哨探，是明朝軍職，又稱「尖哨」，即間諜，由通夷語夷情者擔任，值勤時均著夷服。譚綸、劉應節、戚繼光議定，令哨探各守信地，晝夜輪班瞭望、出哨不輟，避勤、熟睡失哨、出哨逃回者斬，但須冒險出口偵測烽火的「尖夜」，待遇也是軍中最優厚的。以薊州鎮為例，有「明哨」17 處、「暗哨」24 處，均為關口，以地名呼之，每一關口各有專責監控、哨探的 1-3 個屬夷部落，有些哨探關口就是屬夷固定領撫賞銀處，但非每處都是，薊鎮僅有 19 處領賞關口，額賞兀良哈三衛夷人 28,764 名。[84]

哨探、屬夷並行，因兀良哈三衛等部長年屬而不服，言行真偽須加鑑別。嘉靖後期，位置最南的朵顏衛五、六萬部眾投效察哈爾高原的蒙古圖門汗，但仍繼續入貢明朝，[85] 領取撫賞銀，更因部眾增多而年年需索愈增，甚至隨時隨意到關請賞。明軍方面，撫賞銀往往一到邊鎮，便被吞沒七成，因此，隆慶六年二月，總兵戚繼光建立循環冊制度，詳記與三衛往來的銀錢、柴木等項收支，並統一發放撫賞銀物時程：十二月發次年春季分、五月發當年秋季分，命各路將官主其事，對將官

---

[82] 薊遼邊外屬夷為兀良哈三衛，明成祖在大寧之地置此三衛，輔助禦邊，屬薊州鎮管轄。劉效祖，《四鎮三關誌》，楊兆〈四鎮三關誌序〉，頁 2；卷 1，頁 14、43；卷 5，頁 145；卷 6，頁 193、219；卷 7，〈勑總督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兆〉，頁 268；卷 10，頁 522-523；黃彰健等校刊，《明神宗實錄》，卷 48，「萬曆四年三月甲辰」，頁 5a。

[83]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9，頁 271。

[84] 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6，頁 174-177、189、193-194、197。明朝與蒙古長年均向對方施行間諜之策，互相刺探軍情。李喜波，〈從《明實錄》“諜卒”與“虜諜”記載看明蒙關係演變〉，《蘭臺世界》，17（瀋陽：2015），頁 184-185。

[85] 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10，頁 533。

和屬夷均嚴行賞罰。[86] 新制意在加強武官權責，但將官們怠惰撫賞、移防兩事，多委由守關提調處置一應錢糧、文書業務，故萬曆元年初，戚繼光禁止薊鎮二十六個提調再入營城、迎送官府、干預撫賞事，嚴格區分提調守關、將官守營之責。[87]

保持屬夷通貢過程平順，也是戰策重要環節。戚繼光制定策略：貢團出京之日，加派一枝京營，列隊其左右護送、監管，直至通州，換通州兵護送至下一站，站站接力，嚴加控管。北京—通州—三河（密雲）—石門（遵化）—三屯—喜峰口的貢道沿途，均有驛站和軍路，貢團若中途交易，則由護送軍官給票掛號行事，事畢銷號，禁止貢團欺侮衙門；遼東貢道亦循此模式。另外，自永樂起便作為撫賞總關和貢道的喜峰口，除了重修原有內樓，萬曆七年三月，更增建外關樓一座，用以震懾例由此入的兀良哈三衛。[88]

「屬夷」的日常動向，明軍以「哨探」加臺堡布署，進行監控。往例，蒙古入犯必從馬蘭東下；兀良哈三衛討撫賞則從松棚路長城嶺進入，單騎行十里過嶺，再五里入平原，抵達東常谷—西常谷—龍井關。松棚路東界止於灤河，西邊是崖，長城嶺在其間，最前線四臺孤懸邊外，屬夷來往於此，兼行騷擾。戚繼光改於正中一臺設一把總，其餘三臺各一百總，四臺分班遠出哨探，隨時烽火傳警，以制屬夷。哨探熟悉敵情，至有能直趨俺答之子黃台吉（辛愛）營中，當面取其言詞傳回明軍者。[89]

永樂後，明軍慣行的十月出塞燒荒舊法，[90] 也重行於薊遼，輔助哨探、制約屬夷。隆慶四年 (1570) 十月，戚繼光重行此法，親率三屯等營出喜峰口，燒光惡谷至黃崖間草木，便利瞭望，杜絕蒙古近邊住牧，效果應該不錯，因為次年明廷即

---

[86]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10，頁 300-301。明朝以撫賞銀羈縻蒙古為己守邊相關史事，參見邱仲麟，〈明代的兀良哈三衛撫賞及其經費之籌措〉，《明代研究》，27（臺北：2016），頁 1-69。

[87]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11，頁 319-320。提調，亦是武官，位在守備之下，專事守關口；武官大小依次是：總兵—副總兵—參將—遊擊—把總—守備—提調。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8，頁 457-468。

[88]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8，頁 253；卷 11，頁 338。撫賞方面，朵顏衛歸薊州鎮管轄，福餘、泰寧兩衛歸遼東鎮管轄，每年以明帝聖旦為期，歲貢兩次（另一次是年節），每次每衛貢使限 100 人、貢馬 100 匹，在喜峰口關受巡撫總兵驗覈入境，入貢關口不能隨意變換。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10，頁 525、527；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10，頁 302；邱仲麟，〈明代的兀良哈三衛撫賞及其經費之籌措〉，頁 4-7、12-13。

[89]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9，頁 269-271。

[90] 邱仲麟，〈明代燒荒考——兼論其生態影響〉，《臺大歷史學報》，38（臺北：2006），頁 25-63。

敕諭順天巡撫楊兆燒荒。[91] 如屬夷、蒙人入犯，明軍則出戰，軍力旺盛，應付裕如。[92]

萬曆初，屬夷常伴同蒙古汗部入犯，並不安分。萬曆三年正月廿三日，朵顏衛長昂逼長禿犯董家口關城，戚繼光出塞追至離邊 150 里，擒長禿歸。[93] 四月，圖門汗祭旗挾市，青把都、長昂翁婿跟隨，聲言蒙兵二十萬從山海關搶到開原，但五月，蒙古聯軍便解散，僅長昂移住會州，持續窺伺遼東。七月朔，長昂會同伯彥主喇、董狐狸等 240 人款塞請罪，送還明朝尖哨 7 名、生事蒙人 2 名等，乞還撫賞銀與長禿。此次，戚繼光同意其請，諸酋也對天盟誓不再入犯。[94] 遲至萬曆十年，長昂於漁陽受賞完，又隨「西虜」岳父青把都寇寧前；青把都姪哈不慎於上谷受賞完，即隨長昂寇薊遼，均違前約。[95]

因屬夷叛服不常，主政的大學士張居正行「西和東守」戰略，隆慶四年與蒙古西部最大勢力俺答議和、封貢，東部則沿薊遼長城布軍，圍堵遼東邊外、察哈爾高原上的全蒙古大汗——圖門汗勢力，鞏衛北京，避免了明蒙之間的大規模武裝衝突。[96] 薊遼防線上的重鎮，就是戚繼光和遼東總兵李成梁，兩者互相配合。[97] 如萬曆四年三月，圖門汗、伯言兀速、把亥等糾集東西蒙古諸部，欲東攻開原，西搶寧遠錦義，駐遼河一帶，明廷諭令薊遼二鎮戒嚴，前鋒以戰勝為功，不論首級，援將夾擊為主，不許逗撓，李成梁主戰，戚繼光移駐灤東，相機援守，戒備石門至喜峰等路。又如萬曆七年九月，俺答部恰台吉派人於圖門汗處，偵知其為求貢市，擁眾五萬入寇遼東，這次，明廷命李成梁 (1526-1618) 戒備，戚繼光移駐一片石，伺

[91]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9，頁 286；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7，楊兆〈燒荒疏略〉，頁 317。

[92] 如萬曆元年二月，蒙人夜襲挐子谷，薊軍斬其 3 級；四月，桃林口斬 3 級；五月，屬夷董狐狸、甄難等結圖門汗夜犯薊州，被斬 15 級、奪馬 53 匹、369 件器物，董狐狸撫賞被革掉；十月，窟窿臺斬蒙人 6 級。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11，頁 319、320-321、323。

[93] 同前引，頁 324-325；黃彰健等校刊，《明神宗實錄》，卷 40，「萬曆三年七月己亥」，頁 1a。長禿是長昂叔，朵顏都督革蘭台第八子。范中義等，《中國軍事通史．明代軍事史》下冊，頁 753。

[94] 黃彰健等校刊，《明神宗實錄》，卷 37，「萬曆三年四月丙戌」，頁 10a-10b；卷 38，「萬曆三年五月壬戌」，頁 9a-10a；「萬曆三年五月甲子」，頁 10b-11a；方孔炤，《全邊略記》，卷 1，頁 225；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11，頁 328。

[95] 方孔炤，《全邊略記》，卷 1，頁 226。

[96] 自隆慶四年「把漢那吉」事件後，明廷封蒙古西部的俺答為順義王，雙方進入長期的封貢和平時期，「西和」也成為隆萬年間明廷最注重的京邊大事。張廷玉等修，《明史》，卷 19，〈穆宗本紀〉，頁 253-258；卷 20，〈神宗本紀一〉，頁 261-278；卷 21，〈神宗本紀二〉，頁 279-289。

[97] 蕭瑤，〈李成梁與戚繼光〉，《史學月刊》，11（開封：2006），頁 121-124；連彥明，〈李成梁與戚繼光的禦邊思想初探〉，《佳木斯職業學院學報》，3（佳木斯：2016），頁 66。

機出擊，薊遼總督梁夢龍出山海關聲援，十月初二，蒙軍因寧前匱乏而退。[98]

堅固城防加堅壁清野的圍堵戰略，是花費最少、損傷最小之法。明廷諭令「各路營城距邊有在十里、五里之外者，酌議移置近邊，以備戰守」，戰略上沿長城而守，[99] 行堅壁清野之策，屢屢迫使蒙軍因無物可掠而退。此戰略施於薊遼，主要對付尚非屬夷、民族號召力又大的蒙古最大勢力——圖門汗，他覬覦明朝物資，長年攻掠不休，[100] 但始終無法突破薊遼防線，明朝也不與之貢市，隆萬之際的明蒙衝突，多以蒙軍退去作結。遼東總兵李成梁據此戰略也退去蒙兵十餘萬，但他「以戰為守」，薊州戚繼光則是「以守助戰」，應即張居正之策。[101]

「屬夷」是圍堵戰略的外環，但因誠信不足，常成為邊防破口。顯例如萬曆四年六月，薊州屬夷炒蠻（抄蠻）要挾撫賞不成，趁霪雨牆坍，夜犯領賞必經的古北口，殺延綏客兵十人，參將苑宗儒、副將湯克寬等百騎追入十八盤山，中伏戰死。此次重大失誤，突顯出屬夷不可恃，連帶使薊遼軍事革新被批「全無實用，廢時玩寇」，戚繼光等官將被奪俸三個月，炒蠻撫賞止發。[102]

「屬夷」還有性格飄忽、各部關係多變、無法掌控的問題。明軍守備時，須辨別塞外蒙兵的動作是入侵，或僅是部落間的零星爭鬥，雖然依據情報可判定多數狀況，但亦須時加戒備，因為臨時爭鬥隨時可能演變為順勢搶劫。萬曆六年七月，蒙部內鬥，滾兔、數窘部討伐孫不賴，會同逃亡的那莫卜，共萬餘騎，追敵至馬蘭路黃崖外僅百里，便引發明軍戒備，戚繼光率軍，分馬蘭、松棚、牆子嶺、曹家寨四路防堵，卒致無事。[103] 同月，青把都擁眾兩萬，欲搶讎夷、討孫不賴，逼近長城，但預先告知明軍，誓稱秋毫不犯，明軍遂未出動，明廷因此獎賞京邊官將平日撫馭有成。[104] 萬曆七年二、三月，蒙古大嬖只會同小阿卜戶、炒蠻，兩次入寇古

98 黃彰健等校刊，《明神宗實錄》，卷 48，「萬曆四年三月癸卯」，頁 4b；卷 92，「萬曆七年十月己卯、庚子」，頁 1b-2a、7a。

99 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7，〈勑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一鶚〉，頁 231。

100 隆慶三年九月，時值明軍秋防戒嚴之月，圖門汗照樣在駐地鹽廠地方（又稱打卜酥）調北邊生夷、連絡叔祖安灘（西虜、俺答、阿勒坦），號稱數十萬眾，東犯薊州諸路。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8，頁 256。萬曆三年四月，圖門汗又聚大兵威脅開市，聲言從山海關搶到開原，但聯軍僅一個月便解散。黃彰健等校刊，《明神宗實錄》，卷 37，「萬曆三年四月丙戌」，頁 10a；卷 38，「萬曆三年五月壬戌」，頁 9b；「萬曆三年五月甲子」，頁 10b-11a。

101 黃彰健等校刊，《明神宗實錄》，卷 105，「萬曆八年十月己酉」，頁 3a-3b；連彥明，〈李成梁與戚繼光的禦邊思想初探〉，頁 66。

102 黃彰健等校刊，《明神宗實錄》，卷 51，「萬曆四年六月壬午」，頁 16a；劉效祖，《四鎮三關誌》，卷 10，頁 539；方孔炤，《全邊略記》，卷 1，頁 225-226。

103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11，頁 336。

104 黃彰健等校刊，《明神宗實錄》，卷 77，「萬曆六年七月乙丑」，頁 5b-6a。

北口、曹家寨（堡）一帶，蒙人刁兒志火泥赤（力兒志火泥赤）預先通報明軍，大嬖只等也如情報所示，襲擊柏嶺、安邊，明軍因而戒嚴，來犯蒙兵只得自行退去，炒蠻 500 騎還被擒斬十多人。[105] 此三例顯示，屬夷部落關係複雜，兇善難辨，故其情報須再三鑑別，才能訂定對策，僅能作圍堵戰略的輔助應用。

兩個時期的京邊軍事革新計畫：隆慶築城練兵、萬曆薊遼圍堵，一脈相承，明軍戰力大幅提升，更在隆慶和議，蒙古西部俺答與明和平共生的大局勢下，對東部的蒙古大汗勢力形成壓力，使其多次入侵無果、知難而畏。明蒙關係因此進入安穩時期，也達成邊防長治久安的最大軍事目標。

五、結論

隆慶至萬曆初期 (1567-1583)，明朝在長城東段實施的「京邊軍事革新計畫」，是學界所稱的「（嘉）隆萬改革」或「張居正改革」時期的大事，因為有明朝最高統治層的支持，故取得明顯的成效。此計畫涉及軍事、政治和兵馬錢糧，屬於全面性的國家重大戰略行動，其發起與大方向規畫，出於皇帝和內閣大學士，因此，縱使阻力重重，依舊排除萬難，獲得支持與成功，這是此計畫出現和推行的歷史背景。

與此計畫在長城西段同時施行者，就是著名的「隆慶和議」，它們是隆慶時期北邊防線的兩項國防大策，也是大學士張居正主張的「西和東守」戰略。這兩項計畫在明朝艱困的國防時期展開，因此採保守的守勢，後者因緣際會於隆慶四年提早達成，故較出名，它使明朝獲得蒙古西部俺答勢力的合作。然而，「北虜」尚有另一勢力：察哈爾高原上，長城東段的達延汗長子一系，即蒙古大汗，其正統性和對蒙古世界的號召力更勝過俺答，且從不稱臣。因此，「隆慶和議」並未平息北虜問題，而俺答獲封順義王之後，其集團也未必都忠誠事明，仍視利益而動，小搶小犯如昔，故北邊軍事的振興焦點，就全落在東段的「京邊軍事革新計畫」了，而譚綸、戚繼光領導其初期的施行細則與軍事安排，就起著關鍵的作用。

該計畫的起始動作，即是大規模整修城堡樓臺，徹底整治北邊軍事虛弱之因。其次，從南方調來戚繼光抗倭時的舊部——浙兵，以其訓練有素、長年作戰的經

105 戚祚國，《戚少保年譜耆編》，卷 11，頁 338；黃彰健等校刊，《明神宗實錄》，卷 84，「萬曆七年二月丁酉」，頁 7a；卷 85，「萬曆七年三月庚申」，頁 6a；卷 88，「萬曆七年六月癸巳」，頁 4a。

驗，作薊州、昌平一帶邊軍之教練，使之效法，提振兵士戰力。其三，整飭軍隊、善編軍區，使隊伍嚴明、責任清晰，再配合賞罰分明提升軍紀。其四，善用屬夷與哨探，聯合遼東等友鎮強化防守線。凡此四項，是京邊軍事革新計畫的主要步驟。

「京邊軍事革新計畫」經過隆慶二、三年的嘗試、邊做邊改，多次修正後才通過。最初方案因費用、人事牽涉過大，受到多方質疑，只得縮減為先練三萬兵、浙兵調動一萬的規模，且拖延年餘才就緒，困難重重，唯有在保持現況變動最小的狀態下，才能順利展開革新。此期間，薊遼總督譚綸因應各方意見，隨時調整計畫，理出最可行、爭議較小的規模和細則，力助薊昌總兵戚繼光樹立軍權、落實方案，達到至少能開工整修城防、調練軍隊的地步，再與明廷多番商議，取得政經支持，使計畫得以勻支、挪補戶兵兩部和州縣各經費，並能調動將領、布署軍區，打造出適合計畫推動的人事和軍隊組織。執行練兵、修城實務的戚繼光深知行政支援之不易得，加緊腳步，積極任事，卒致臺堡堅實、營伍整備，薊昌邊防實力大為提升。計畫前期的各項試行作法，則於隆慶六年的京邊大閱兵後匯聚成型，由負責巡邊閱視的兵部侍郎汪道昆奏准，融入原邊防制度中，成為定制，供往後改革參照。

京邊軍事革新計畫將高薪（1.5 兩月餉）募兵、鎮權專一、兵區權責分明、連綿的臺堡與烽火系統、外來實戰浙兵教練薊昌安逸北兵等新做法，帶入舊有的邊鎮、城防、車營、火器等組織中，以築空心敵臺、善待士兵為經，精實兵馬、實戰教練為緯，徹底改變薊遼邊兵的習氣和戰鬥力，達成壯大明軍的任務。強盛的明軍、紮實的城防、堅壁清野的戰策，將蒙古各部大舉入侵、多次搶擄的強勢，轉變為僅能小規模入寇，更傾向求貢市、撫賞等往來方式的平靖之局。

經過隆慶時期的整頓，萬曆初期，明朝邊防能力已足以制馭蒙古，開始採取薊昌、遼東兩線合作圍堵戰略：沿長城堅實臺堡嚴密布軍，圍堵蒙古入侵。長城東線的蒙古大汗勢力，不臣服、不入貢，持續聚眾擾邊，是薊遼圍堵戰略的主要對象。此戰略聯合「隆慶和議」中成為盟友的俺答部，搭配上其他屬夷、哨探、撫賞銀等小戰策，達成知己知彼、誘敵為己所用等效果，為馭邊用盡其極。薊遼區域的屬夷，主要是兀良哈三衛，雖於明初即臣服，但游移於明蒙間圖生存，至隆萬之際甚至是「兩屬」狀態，為邊防雙面刃，故須用明軍內通蒙語蒙情的哨探加以偵查，再加市賞之利，才構成助守邊防的人力系統。戚繼光於屬夷出入境領撫賞沿途，更加派重兵監督，杜絕所有出亂子的可能，提升監控層級至滴水不漏的地步，這也是大學士張居正主導以守禦為本的邊防國策下，能達成的最佳境界。

京邊軍事革新計畫卓有成效，除了前線戚繼光全力練兵修城、年年輪番更換浙

兵示範教練外，歷任薊遼總督譚綸、劉應節、楊兆、梁夢龍等文官，在處理行政手續、籌措糧餉、與朝廷斡旋交涉上竭盡心力；明廷中，內閣大學士、巡邊御史、各部官員們，無不盡力配合此計畫，予其最大協助，並不斷監督、建議，均是促成改革成功、京邊長城帶國防實力大盛的原因。明廷允准此項「軍權高度一統、財權供應屢創例外」的軍事革新計畫，目的當然是安定北邊、拱衛北京、克鎮蒙古，事實也證明，它的放權與支持，確實收到預期成效，使國防力量達於明朝中後期之巔峰，與「隆慶和議」並列為這段時間裡，長城帶東、西兩邊明蒙關係從戰爭走向和平的最大原因。

（責任校對：廖安婷）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方孔炤 Fang Kongzhao，《全邊略記》*Quanbian lueji*，《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史部第 738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明崇禎刻本 Ming Chongzhen keben。

王納言 Wang Nayan 修，石邦政 Shi Bangzheng 纂，（隆慶）《豐潤縣志》(Longqing) *Fengrun xianzhi*，《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史部第 201 冊，臺南 Tainan：莊嚴文化 Zhuangyan wenhua，1996，明隆慶四年 (1570) 刻本 Ming Longqing si nian (1570) keben。

張廷玉 Zhang Tingyu 等修，《明史》*Ming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7。

張居正 Zhang Juzheng，《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Xinke Zhang Taiyue xiansheng wenji*，《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346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明萬曆四十年 (1612) 刻本 Ming Wanli sishi nian (1612) keben。

戚祚國 Qi Zuoguo，《戚少保年譜耆編》*Qi shaobao nianpu qibian*，《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史部第 553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清道光二十七年 (1847) 仙遊崇勳祠刻本 Qing Daoguang ershiqi nian (1847) Xianyou Chongxunci keben。

戚繼光 Qi Jiguang，《練兵雜紀》*Lianbing zaji*，《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集部第 728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1983，清乾隆四十六年 (1781) 校本 Qing Qianlong sishiliu nian (1781) jiaoben。

黃彰健 Huang Chang-chien 等校刊，《明實錄》*Ming shilu*，臺北 Taipei：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1962。

楊　博 Yang Bo，《楊襄毅公奏疏》*Yang Xiangyi gong zoushu*，收入陳子龍 Chen Zilong 編，《皇明經世文編》*Huangming jingshi wenbian*，《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659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明崇禎刻本 Ming Chongzhen keben。

劉　堉 Liu Qing 纂修，傅修 Fu Xiu 續纂修，（乾隆）《直隸遵化州志》(Qianlong) *Zhili Zunhua zhouzhi*，「中國方志庫」"Zhongguo fangzhiku"，北京 Beijing：愛

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 Airusheng shuzihua jishu yanjiu zhongxin，清乾隆五十九年 (1794) 刻本 Qing Qianlong wushijiu nian (1794) keben。

劉效祖 Liu Xiaozu，《四鎮三關誌》*Si zhen san guan zhi*，《四庫禁燬書叢刊》*Siku jinhuishu congkan* 史部第 10 冊，北京 Beijing：北京出版社 Beijing chubanshe，1997，明萬曆四年 (1576) 刻本 Ming Wanli si nian (1576) keben。

譚 綸 Tan Lun，《譚襄敏公奏疏》*Tan Xiangmin gong zoushu*，收入陳子龍 Chen Zilong 編，《皇明經世文編》*Huangming jingshi wenbian*，《續修四庫全書》*Xuxiu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659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5，明崇禎刻本 Ming Chongzhen keben。

二、近人論著

于默穎 Yu Moying，《明蒙關係研究——以明蒙雙邊政策及明朝對蒙古的防禦為中心》*Ming Meng guanxi yanjiu: yi Ming Meng shuangbian zhengce ji Mingchao dui Menggu de fangyu wei zhongxin*，呼和浩特 Hohhot：內蒙古大學博士論文 Neimenggu daxue boshi lunwen，2004。

孔維媛 Kong Weiyuan，《三屯營城空間演變研究》*Santun yingcheng kongjian yanbian yanjiu*，天津 Tianjin：天津大學碩士論文 Tianjin daxue shuoshi lunwen，2017。

王國良 Wang Guoliang 編，《中國長城沿革考》*Zhongguo Changcheng yange kao*，收入王挺之 Wang Tingzhi 等編，《中國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歷史文獻叢書》*Zhongguo shijie wenhua he ziran yichan lishi wenxian congshu* 第 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tong daxue chubanshe，2011，景印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3 年印本 Yingyin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1933 nian yinben。

田 然 Tian Ran，《戚繼光戍薊方略及其對明蒙關係的影響》*Qi Jiguang shu Ji fanglue ji qi dui Ming Meng guanxi de yingxiang*，呼和浩特 Hohhot：內蒙古大學碩士論文 Neimenggu daxue shuoshi lunwen，2018。

朱 澤 Zhu Ze，〈詩劍之交：記汪道昆、戚繼光的友誼片段〉"Shi jian zhi jiao: ji Wang Daokun, Qi Jiguang de youyi pianduan"，《安徽史學》*Anhui shixue*，5，合肥 Hefei：1984，頁 32-38。

李喜波 Li Xibo，〈從《明實錄》"諜卒" 與 "虜諜" 記載看明蒙關係演變〉"Cong *Ming shilu* 'diezu' yu 'ludie' jizai kan Ming Meng guanxi yanbian"，《蘭臺世界》*Lantai shijie*，17，瀋陽 Shenyang：2015，頁 184-185。

孟 修 Meng Xiu，《土木之變與庚戌之變比較研究——朝貢體制框架下的明蒙關係新探》*Tumu zhi bian yu Gengxu zhi bian bijiao yanjiu: chaogong tizhi kuangjia xia*

de Ming Meng guanxi xintan，哈爾濱 Harbin：黑龍江大學碩士論文 Heilongjiang daxue shuoshi lunwen，2010。

孟凡云 Meng Fanyun，〈論把漢那吉降明事件與“遠人請貢”〉“Lun Bahannaji xiang Ming shijian yu ‘yuanren qinggong’”，《民族研究》*Minzu yanjiu*，8，北京 Beijing：2008，頁 75-84。

邱仲麟 Chiu Chung-lin，〈明代燒荒考——兼論其生態影響〉“Mingdai shaohuang kao: jian lun qi shengtai yingxiang”，《臺大歷史學報》*Taida lishi xuebao*，38，臺北 Taipei：2006，頁 25-63。doi: 10.6253/ntuhistory.2006.38.02

_____，〈明代的兀良哈三衛撫賞及其經費之籌措〉“Mingdai de Wuliangha san wei fushang ji qi jingfei zhi choucuo”，《明代研究》*Mingdai yanjiu*，27，臺北 Taipei：2016，頁 1-69。

胡　凡 Hu Fan，〈論明世宗對蒙“絕貢”政策與嘉靖年間的農牧文化衝突〉“Lun Ming Shizong dui Meng ‘jue gong’ zhengce yu Jiajing nian jian de nongmu wenhua chongtu”，《中國邊疆史地研究》*Zhongguo bianjiang shidi yanjiu*，15.4，北京 Beijing：2005，頁 43-55。

范中義 Fan Zhongyi，《戚繼光傳》*Qi Jiguang zhu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3。

_____，〈戚繼光在薊鎮〉“Qi Jiguang zai Jizhen”，收入中國明史學會 Zhongguo Mingshi xuehui 編，《明代薊鎮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Mingdai Jizhen wenhua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唐山 Tangshan：中國明史學會 Zhongguo Mingshi xuehui，2010，頁 9-47。

范中義 Fan Zhongyi 等，《中國軍事通史．明代軍事史》*Zhongguo junshi tongshi, Mingdai junshi shi* 下冊，北京 Beijing：軍事科學出版社 Junshi kexue chubanshe，1998。

韋慶遠 Wei Qingyuan，《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Zhang Juzheng he Mingdai zhonghouqi zhengju*，廣州 Guangzhou：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Guangdong gaodeng jiaoyu chubanshe，1999。

唐玉萍 Tang Yuping，〈張居正、高拱在“隆慶和議”中的作用對比〉“Zhang Juzheng, Gao Gong zai ‘Longqing heyi’ zhong de zuoyong duibi”，《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Chifeng xueyuan xuebao (Hanwen zhexue shehui kexue ban)*，31.5，赤峰 Chifeng：2010，頁 17-22。doi: 10.13398/j.cnki.issn1673-2596.2010.　05.004

烏雲畢力格 Wuyun Bilige、白拉都格其 Baila Dugeqi 主編，《蒙古史綱要》*Menggushi gangyao*，呼和浩特 Hohhot：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2006。

馬楚堅 Ma Chor-kin，〈明代搪報之創生及其編制〉"Mingdai tangbao zhi chuangsheng ji qi bianzhi"，《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Zhongguo wenhua yanjiusuo xuebao*，17，香港 Hong Kong：1986，頁 203-235。doi: 10.29708/JCS.CUHK.198601_17.0008

馬靜茹 Ma Jingru，〈戚繼光鎮守薊鎮前後境遇的變化〉"Qi Jiguang zhenshou Jizhen qianhou jingyu de bianhua"，《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Jiangnan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12.1，無錫 Wuxi：2013，頁 74-80。

常正勃 Chang Zhengbo，《戚繼光與薊鎮防務再探——以戚繼光與官員互動為視角》*Qi Jiguang yu Jizhen fangwu zaitan: yi Qi Jiguang yu guanyuan hudong wei shijiao*，呼和浩特 Hohhot：內蒙古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Neimenggu shifan daxue shuoshi lunwen，2015。

張姍姍 Zhang Shanshan，《明代薊鎮長城預警系統研究》*Mingdai Jizhen Changcheng yujing xitong yanjiu*，呼和浩特 Hohhot：內蒙古大學碩士論文 Neimenggu daxue shuoshi lunwen，2013。

張健榮 Zhang Jianrong，〈薊鎮防務與戚繼光的軍事思想研究〉"Jizhen fangwu yu Qi Jiguang de junshi sixiang yanjiu"，《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Sanmenxia zhiye jishu xueyuan xuebao*，11.2，三門峽 Sanmenxia：2012，頁 70-72。

張雪瑞 Zhang Xuerui，〈淺論明世宗時期明蒙關係〉"Qianlun Ming Shizong shiqi Ming Meng guanxi"，《北方文學》*Beifang wenxue*，3，哈爾濱 Harbin：2016，頁 160-161。

連彥明 Lian Yanming，〈李成梁與戚繼光的禦邊思想初探〉"Li Chengliang yu Qi Jiguang de yubian sixiang chutan"，《佳木斯職業學院學報》*Jiamusi zhiye xueyuan xuebao*，3，佳木斯 Jiamusi：2016，頁 66。

童來喜 Tong Laixi，《戚繼光》*Qi Jiguang*，北京 Beijing：軍事科學出版社 Junshi kexue chubanshe，1991。

紫 西 Zi Xi，〈戚繼光與薊鎮長城防務〉"Qi Jiguang yu Jizhen Changcheng fangwu"，《文物春秋》*Wenwu chunqiu*，2，石家莊 Shijiazhuang：1998，頁 65-67。doi: 10.13635/j.cnki.wwcq.1998.02.012

費克光 Carney T. Fisher 著，許敏 Xu Min 譯，〈論嘉靖時期 (1522-1567) 的明蒙關係〉"Lun Jiajing shiqi (1522-1567) de Ming Meng guanxi"，《民族譯叢》*Minzu yicong*，6，北京 Beijing：1990，頁 38-45。

黃仁宇 Ray Huang，《萬曆十五年》*Wanli shiwu nian*，臺北 Taipei：食貨出版社 Shihuo chubanshe，1995。

趙 文 Zhao Wen，〈明神宗"逆革順賞"策略對明蒙關係帶來的影響〉"Ming Shenzong 'ni ge shun shang' celue dui Ming Meng guanxi dailai de yingxiang"，《中南民族大

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Zhongnan minzu daxue xuebao (renwen shehui kexue ban)*，33.5，武漢 Wuhan：2013，頁 56-59。

趙　英 Zhao Ying、鍾少異 Zhong Shaoyi，〈張居正北部邊備思想研究〉"Zhang Juzheng beibu bianbei sixiang yanjiu"，《國防》*Guofang*，2，北京 Beijing：2019，頁 80-85。doi: 10.15969/j.cnki.11-2770/e.2019.02.018

趙　毅 Zhao Yi、于寶航 Yu Baohang，〈張居正與戚繼光關係論略〉"Zhang Juzheng yu Qi Jiguang guanxi lunlue"，《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Liaoning shif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36.5，大連 Dalian：2013，頁 747-753。

趙鑫華 Zhao Xinhua，《明蒙關係研究——以使臣為中心》*Ming Meng guanxi yanjiu: yi shichen wei zhongxin*，北京 Beijing：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 Zhongyang minzu daxue shuoshi lunwen，2011。

潘秀華 Pan Xiuhua，〈薊鎮古城三屯營探論〉"Jizhen gucheng Santunying tanlun"，《萬里長城》*Wanli Changcheng*，4，北京 Beijing：2011，頁 12-20。

盧如平 Lu Ruping，〈明長城的 "師範" 和 "藍本"——台州府城牆的特色與價值研究〉"Ming Changcheng de 'shifan' he 'lanben': Taizhoufu chengqiang de tese yu jiazhi yanjiu"，《台州學院學報》*Taizhou xueyuan xuebao*，33.4，台州 Taizhou：2011，頁 10-13。doi: 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11.04.013

閻崇年 Yan Chongnian 主編，《戚繼光研究論集》*Qi Jiguang yanjiu lunji*，北京 Beijing：知識出版社 Zhishi chubanshe，1990。

蕭　瑤 Xiao Yao，〈李成梁與戚繼光〉"Li Chengliang yu Qi Jiguang"，《史學月刊》*Shixue yuekan*，11，開封 Kaifeng：2006，頁 121-124。

Fisher, Carney T. "Smallpox, Salesmen, and Sectarians: Ming-Mongol Relations in the Jiajing Reign (1522-67)," *Ming Studies*, 1, 1988, pp. 1-23. doi: 10.1179/014703788788760510

Serruys, Henry. "Mongols Ennobled during the Early M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2, 1959, pp. 209-260. doi: 10.2307/2718543

Military Reform Around Beijing from the Longqing to the Early Wanli Era (1567-1583)

Lee Hua-y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huayen@cc.ncue.edu.tw

ABSTRACT

From the Longqing 隆慶 to the early Wanli 萬曆 era (1567-1583), the Ming court implemented a large-scale program of military reform around Beijing, especially the military region of Jizhou 薊州. This program was mainly designed and led by Tan Lun 譚綸 (1520-1577), the governor-general of Ji-Liao 薊遼, and Qi Jiguang 戚繼光 (1528-1587), a prominent general. They used Qi's former subordinates, Zhejiang soldiers—a well-trained, victorious army against Japanese pirates—as the instructors to train and reorganize the Jizhou-Changping 昌平 troops, and built and repaired local Great Wall fortresses at the same time. They reversed the weak Ming defense force after the Gengxu 庚戌 Incident in 1550. The Longqing Peace Treaty, in which the Ming government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Altan Khan 俺答 (1507-1582), the main power of western Mongolia, and permitted his request for trade, had great influence and increas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ilitary reform program. The reform and the treaty were both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when the Ming-Mongol relationship improved across the east and west sides of the Great Wall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6th century. Because of this reform, northern Ming military strength returned, and they were able to intimidate the Mongol khan on the Chahar Plateau in the east. Such an important program must have its shaping process, steps for implementation, and specific measures; however, the support from the Ming government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It finally launched the traditional military system onto a new path. These topics have not often been discussed in past papers. Thus, I will focus on them and view the changing Ming-Mongol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lens of these historical facts.

Key words: Jizhou 薊州, military reform, Qi Jiguang 戚繼光, Ming-Mongol relationship,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Ming Dynasty

Réforme militaire à la périphérie de la capitale de l'ère Longqing au début du règne Wanli (1567-1583)

De l'ère Longqing 隆慶 au début du règne Wanli 萬曆 (1567-1583), la cour des Ming mit en place un projet de réforme de grande envergure dans les régions de Jizhou 薊州 et Changping 昌平, situées dans la périphérie de la capitale. Sous la direction du gouverneur général Tan Lun 譚綸 (1520-1577) et du général réputé Qi Jiguang 戚繼光 (1528-1587), cette réforme réussit à renforcer la défense à la frontière nord, laquelle avait été affaiblie après l'Incident de Gengxu 庚戌 (1550). Parallèlement, les négociations visant à établir la paix entre le gouvernement Ming et Altan Khan 俺答 (1507-1582) augmentèrent l'efficacité dudit projet de réforme militaire. Ce sont là les deux événements majeurs qui conduisirent les Ming et les Mongols vers la paix. Ledit projet amena le Khan mongol de la partie orientale de la plain Chahar à freiner ses ambitions, ce qui montre son importance. Afin de mieux observer l'évolution des relations entre les Ming et les Mongols, cet article examine systématiquement la formation du projet, les procédés de mise en œuvre, le soutien de la cour des Ming, ainsi que l'établissement de nouveaux règlements.

Mots clés : Jizhou 薊州, réforme militaire, Qi Jiguang 戚繼光, relations Ming-Mongol, Histoire militaire des Ming

隆慶～萬曆初期（1567-1583）北京周辺の軍事改革

隆慶年間から萬曆初期（1567-1583）にかけて、明朝は北京郊外の薊州と昌平一帯で大規模な軍事改革計画を実行した。薊遼総督の譚綸（1520-1577）と名将・戚継光（1528-1587）による改革は、嘉靖庚戌の変（1550）以降、弱体化した明の北方防衛能力を復活させることにつながった。同時に展開された「隆慶和議」（明朝と蒙古西部の首長アルタイ＝ハン（1507-1582）との和議）は、「京辺軍事改革計画」の成功と効果を高めたことは、16 世紀後半の長城の東西地域における明・蒙古関係を戦争から平和へと導いた二大事件であった。この計画の重要性は、東部チャハル高原における蒙古帝国の勢力弱体化につながったことにも現れている。ただその成立と実施過程、明朝による支持、及び最終的な新制度については、研究者によって殆ど言及されていない。本稿では、これらの問題を中心に史実を整理し、この時期の明・蒙古関係の変遷を考察する。

キーワード： 薊州、軍事改革、戚継光、明・蒙古関係、明代軍事の歴史

Militärreformen in der Gegend von Beijing während der Longqing und frühen Wanli Ära (1567-1583)

Dieser Artikel diskutiert die umfassende Militärreform während der Longqing 隆慶 und frühen Wanli 萬曆 Ära, die der Minghof für das Militär in der Gegend um Beijing und in der Militärzone in Jizhou 薊州 implementierte. Die Initiatoren und Führer dieses Programms waren der Governeur-General von Ji-liao 薊遼, Tan Lun 譚綸 (1520-1577) und der General Qi Jiguang 戚繼光 (1528-1587). Die Jizhou-Changping 昌平 Truppen wurden von Qis Untergebenen, erfolgreichen und gut trainierten Soldaten aus Zhejiang, instruiert; gleichzeitig bauten und restaurierten sie die lokalen Teile der Großen Mauer. Diese Reform, zusammen mit dem Longqing Friedensvertrag zwischen dem Minghof und dem Mongolischen Khan, waren bedeutende historische Momente, die das Ming-Mongolenverhältnis im 16. Jahrhundert wesentlich verbesserten und die Stärke des Ming Militärs im Norden maßgeblich restaurierten. Der Artikel konzentriert sich inbesondere auf den Prozess, der zur Implementierung der Militärreform diente, und seine Unterstützung seitens der Mingregierung.

Key words: Jizhou 薊州, Militärreform, Qi Jiguang 戚繼光, Ming-Mongol Beziehungen, Militärgeschichte der Ming Dynastie

（收稿日期：2021. 2. 17；修正稿日期：2021. 6. 20；通過刊登日期：2021. 10. 19）